

利瑪竇“送禮”初探

謝貴安*

利瑪竇（Matteo Ricci），字西泰，1552年10月6日生於意大利中部安柯那（Ancona）省馬塞拉塔（Macerata）城，1583-1589年在肇慶傳教，後往韶州、南昌、南京和北京傳教，1610年5月11日病逝於北京。利瑪竇之所以能步步為營而後長驅直入，進入中華帝國的首都北京傳教，有一個重要原因，便是他用“送禮”的方法溝通人際關係而成其大業的。對於利瑪竇的研究，學界討論甚詳，成果頗豐，但就其送禮問題雖多有論著從旁涉及⁽¹⁾，然未見有專門研究。本文擬就此問題作一初步探討。

利瑪竇送禮原因、目的及策略

以利瑪竇為代表的中國傳教團送禮的原因和目的，是為了打開人際溝通的障礙，實施其“適應性傳教策略”。

中國是禮儀之邦，重視禮尚往來，但官場腐敗和社會黑暗，使得“禮儀之邦”成了請客送禮和賄賂成風的國度，辦任何事，如果不送禮就很難達到目的。正是窺透了中國“國情”，利瑪竇才不惜血本，準備豐厚的禮物，走一路送一路，為其辦教堂、傳教打開方便之門。利瑪竇把這些結交中國官員乃至皇帝的西方器物自鳴鐘、三稜鏡、鏡子、砂漏、風琴等禮品，稱之為“給社會進步的齒輪裡注潤滑油”⁽²⁾。在肇慶期間，利瑪竇忙於以銅、鐵為原料製作天球儀、地球儀和日晷，分送各友好官員。他在1585年10月20日寄給耶穌會總長的信中曾經解釋道：“我正忙於這些瑣碎之事，而把重要的事留給別人去做。”⁽³⁾其實他比誰都清楚，正是這些瑣碎之事，才關乎天主教在中國傳播的命運。利瑪竇送禮的根本原因和目的，是通過“禮尚往來”與中國士大夫直至皇帝建立友好關係，從而達到在中國站穩腳跟以便傳播其天主教教義的目標。利瑪竇曾“拿郭居靜神父帶來的一部分新奇禮品分送幾位大臣，希望以

此換得信件和推薦書”⁽⁴⁾，以便能夠順利到達北京並獲得皇帝召見。利瑪竇通過送禮讓受禮者產生愛屋及烏的心理，增強好感，以便能夠獲得在中國的居留權和傳播天主教的機會。神宗“皇帝陛下對這些新奇的鐘如此着迷，於是他不僅想看看其它的禮品，也想看看這些送來禮物的異國人”⁽⁵⁾。由於所送禮品是先進技術製成，為了讓其中的科技儀器和產品能夠運轉，必須依賴於耶穌會士，於是神父們便在北京居留下來：“奉命管理自鳴鐘的太監們也打算把神父們留下，怕的是如果有一座自鳴鐘出點毛病，沒有人修理。”⁽⁶⁾於是，利瑪竇等人便真的在北京居住了下來，並在死後獲贈墓地和宅第，使天主教在北京有了傳播的基地。利瑪竇等人送禮的目的，在他們發展明朝通政使許胥臣入教的過程中，清晰地顯露了出來。利瑪竇的手下、南京教堂的王豐肅神父叫人替許胥臣“做了一個天球儀和一個地球儀，他在上面加上了適當的註釋。這大大增進了他們的友誼和相互的尊敬”。通過贈送這些西洋奇器，引起許胥臣的好奇和敬佩之心，然後乘機告訴他，這些東西裡的學問遠遠不及天主教的深奧道理：“那位大臣正在很嚴肅地稱贊科學研究，王豐肅神父就說：‘先生，到目前為止，你從我這裡學到的東西比起信仰的奇跡來，全是微不足道的。信

*謝貴安，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暨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明清文化史和中國史學史。

奉上帝是比觀看星象更加崇高的科學’。”這樣，許胥臣便成了加入天主教會當時官階最高的官員，神父們驚呼“再沒有更好的例子可以說明上天在運用科學來使中國的學者歸信”(7)，可見送禮祇是利瑪竇等人傳播天主教教義的誘餌，而後者才是其送禮的根本目的。

利瑪竇送禮的另一個原因，是受到天主教來華前輩的影響。最先到中國來的傳教士沙勿略，乘船達到中國廣州海外的上川島時，向偶遇的故交、富商迭戈·皮來拉(Diogo Pereira)描述了到中國去並想拜訪皇帝的計劃。皮來拉建議他最好帶些朝貢的禮品。沙勿略為了到達大陸，將其積蓄和友人饋贈的超過二百金幣的胡椒作為報酬，預付給了一個廣州商人，讓他幫助偷渡到大陸，但未能成行，最後死在島上。利瑪竇的前輩和領導、神父羅明堅在帶着巴範濟、利瑪竇等人從澳門到廣東傳教，曾多次向中國官員送禮甚至行賄。1582年12月27日，羅明堅、巴範濟等人從澳門抵達肇慶，在受到總督陳瑞接見時，立即呈上精巧的鐘錶和幾隻產自威尼斯的三稜鏡。陳瑞見到這些奇異的西器時，臉色立刻由陰轉晴，於是同意贈給羅明堅等一棟靠近天寧寺的房屋。這增強了羅明堅的信心，他認為祇要贈送這些裝璜豪華的鐘錶、裝幀精美的繪圖《聖經》，以及幾張織有新舊約故事的掛氈，教皇的使節便可以進入北京並達到目的。在1584年1月25日寄給總會長阿瓜維瓦(Claudio Acquaviva)的信中，羅明堅請他贈予一座鍍金鐘錶，“將作為朝貢之物，呈獻給中國皇帝，以便求得准許，在中國傳播福音”(8)。連巴範濟也認識到：“歸根到底，在中國送禮、花錢就好辦事。”

利瑪竇顯然受到這些前輩的深刻影響。據喬納森·斯彭斯稱：“從保存下來的里奇(利瑪竇)與拉吉利(羅明堅)的信件中可以看出，自着手傳教工作起，他們就這樣不倦地尋求着使傳教事業獲得成功的策略，這就是給中國人送去合宜的禮物。他們看出，這可能是他們整個艱巨事業獲得成功的關鍵。(……)在他們還未能真正掌握足夠的漢語，並用此來解釋複雜的科學概念之前，這些耶穌會士把鐘錶

作為贏得中國人民喜愛的一個關鍵寶物。這是一個更實際的決策，是把西方的鐘錶製造技術同中國古老鐘錶製造技術相比較後作出的抉擇。”(9)通過這些通信，利瑪竇已經從羅明堅身上獲得送禮的經驗和啟示。利瑪竇還聽到過羅明堅與中國官員之間“禮尚往來”的事例，據他回憶：“該省(廣東)的軍事首腦也是他(指羅明堅)的朋友，羅明堅送給他一塊錶；這是一種用許多小金屬齒輪安裝成套的計時工具。這位官員被稱為總兵，也就是將軍(指黃應甲)，在神父有機會訪問他時，他也對神父特別禮遇。這些與官員的早期友誼，對於發展對基督教的友好態度是很有價值的。”(10)羅明堅在廣州時，曾經向一些中國官員表示想以歐洲教宗的名義派使節去北京。這些官員告訴羅明堅，如果到北京，“最好的禮物應算一架裝璜豪華且體積大的鐘錶，每小時皆報時，將置放在皇宮中，可以聽很遠；再送一隻小型的(……)上有把手，每點鐘報時，或類似的皆可”。(11)這對利瑪竇也有很大的啟發。後來利瑪竇到北京向萬曆皇帝呈獻的禮物中，便有“自鳴鐘大小貳架”。

當然，在平時的送禮活動中，懷有各種各樣的具體目的，如解除厄困、改善處境等。當利瑪竇等人在贛州翻船出事後，石星拒不讓利瑪竇繼續隨其前行，利瑪竇於是拿出三稜鏡，使石星改變了態度。抵達北京後，雖說皇帝接受了利瑪竇等人的獻禮，但對其去留並未作明確的指示，於是被禮部主客司軟禁於會同館(四夷館)中。“據說利瑪竇神父能向負責管事的人送禮的話，就不會有任何阻力了。他對這一建議的回答是，他認為禮物最好是用來使神父們從這種情況中獲得釋放。”(12)同時還通過傳教，獲得中國官員的居留許諾和代寫推薦信等等，這些將在後面第五部分細述。

利瑪竇也講究送禮的策略，這些策略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是選擇最具有吸引力、富有科技含量的禮品。與以往“外夷”所貢的“方物”如長頸鹿、大象、駝鳥、寶石等相比，利瑪竇所送禮品具有“高附加值”和“科技含量”，是西方近代早期科技的

結晶，為中國皇帝及其大臣見所未見的新鮮玩藝。當時中國傳統朝貢國使臣“進貢”的禮物十分粗糙。“在進貢給皇上的禮品中，神父們看到一把劍，那簡直就是一塊鋼片，粗陋地從鐵砧上打鑄出來的，住在這房子（禮部主客司員外郎所管的會同館）裡的某個人給它配了一個斧頭手柄一樣的木把。在同類禮物中，還有用皮條粗製濫造編成的胸甲，他們還帶來馬匹，但飼養得極差，一到北京就餓死了。”⁽¹³⁾而利瑪竇等傳教士送來的禮物則十分新穎和精巧，魅力十足。在肇慶時，利瑪竇在教堂陳列的西洋器物，引起了中國各階層人的喜愛，“這些來訪可能是由收藏的歐洲珍奇而引起的。客人們最稱羨的是他為教堂和鄰居所樹立的那座鐘。它靠一口大鈴來報時，不僅把一天的時間告訴過客，而且告訴遠處的人；他們始終弄不明白它怎能不用人敲擊就自己發聲”⁽¹⁴⁾。當一位世俗兄弟問基督教信徒“你的主人有甚麼迷魂藥，能把這麼多人的心靈都迷住了？”時，這位世俗兄弟回答說：“我的主人有德，有教養和書籍，有至高的上帝之道，那是他在一切場合都要傳播的，除了贏得大人物的心靈以外，他們確實再沒有更有力量的藥劑。”⁽¹⁵⁾其實這種回答祇是基督教徒的自戀自信，而更直接的因素則在於利瑪竇等神父所攜帶和贈送的禮物，具有十分獨特的魅力，可以說具有強大的“殺傷力”，使大多數的中國官員在它面前失去了自恃力。利瑪竇前往北京時的同行太監，也認識到利瑪竇所送禮品的新奇珍貴性，他告訴天津稅監馬堂：“那些都是極為新穎而且非常貴重的禮品。”他向馬堂保證，“這些禮物足以使馬堂得到君王的恩寵”。而馬堂“看到這些禮品大為高興，說這些禮品大為配得上獻給皇帝，哪怕是中國皇帝”⁽¹⁶⁾。正因為利瑪竇選擇富有高附加值和科技含量的西方禮品，才能博得上至皇帝下至官員的深深喜愛，為利瑪竇一路北上大開綠燈。當然，利瑪竇在送西洋奇器的同時，也夾雜一些基督教物品，如耶穌像、聖母像、聖經、十字架等，這樣做也是其送禮策略之一，既不引起中國人反感，又不失時機地讓中國人接觸到基督教的“聖物”。

第二是大做廣告，宣傳西方奇器的優點和魅力，增加禮品的價值和重要性。

利瑪竇送禮的策略是，先在教堂裡大做廣告，等到這些禮品廣為人羨時再去送人。在肇慶教堂的聖堂中央，據利瑪竇描述，便供奉着聖母瑪利亞的精美畫像，牆上掛着一幅用歐洲文字標注的世界地圖，周圍陳列着被中國人視為“無價之寶”的三稜鏡、鐘錶、日晷、洋裝書、天鵝絨等來自歐洲的器物。同年11月，又在房舍附近建成了一座“相當高而美觀”的鐘樓，高十八尺，呈八角形，“在頂端我們置一鐵柱，最上有一鍍金銅球，用兩條鐵絲繫牢。”⁽¹⁷⁾每當鐘樓準點報時時，鈴聲悠揚，悅人耳目。這些西方奇器成為遠近民眾摩肩接踵前來參觀的主要對象。進入南昌後，利瑪竇也將西式奇器陳列出來，廣為宣傳。他在1595年11月4日寫給耶穌會總會長阿瓜維瓦的信中，談到了南昌市民摩肩接踵地拜訪他的原因之一，便是前來觀賞來自歐洲的各種器物，“會院所展示的三稜鏡、油畫、精裝書籍、世界地圖以及各種科學儀器，都是以往不曾見過的器物，民眾頗感新奇”⁽¹⁸⁾。到北京後也是如此，以至於明清人在描述天主教堂時，都會提到這些西洋奇器。通過廣告宣傳，西洋奇器被人廣為談論和豔羨，這時再送上類似的禮物，便使受禮人倍覺珍貴。

在給皇帝送禮的過程中，利瑪竇的策略也是先大肆宣傳和張揚，讓中國各地官員都知曉，以減少阻力和避免被驅逐的命運，然後伺機傍上大官，靠他們的力量將自己帶到首都，把禮物送到皇帝手中，以期獲得皇帝的青睞，在中國的心臟地帶站穩腳跟。在南昌時，“利瑪竇神父……讓他（建安王）看了準備送給皇帝的鐘和其它禮品”⁽¹⁹⁾。南京禮部尚書王弘誨⁽²⁰⁾（忠銘）抵達南昌時，“神父們就去拜訪他，（……）說他們很想去北京，給皇帝帶去一些禮品。尚書要求看看禮品並大為高興”⁽²¹⁾。靠王弘誨這類高官，利瑪竇神父“他們甚至不操心去取得旅行護照，像在過去其它的場合那樣。有這樣一位特殊的大官同行，要比護照更保險”。⁽²²⁾利瑪竇在與應天巡撫趙可懷會面後，“利瑪竇神父隨身帶

來準備呈給皇帝的一些禮品，以便談論有關向皇帝奉獻禮品的話題。這些禮品中有一幅非常講究的裝在一個透明玻璃框裡的耶穌十字架像”。王弘誨帶利瑪竇到北京後，向他所熟悉的皇宮太監轉上送禮給皇帝的申請，“這個太監也答應盡力促成這件如此重要的事，並要求看看神父們和他們給皇帝帶來的禮品。在約好的那天，太監和尚書（王弘誨）一同到神父們的住處來看禮品。（……）利瑪竇神父讓他們看了自鳴鐘、十字架像、一尊聖母雕像、一座八音琴，這類東西是中國人聞所未聞的，還有兩架玻璃三稜鏡。當那尊聖母像被抬起來放在地上時，它從搬夫的手中脫落，被摔成了三段。那在歐洲就會失去它的價值了，但在中國卻祇會增加它的價值。當幾段又拼合起來後，雕像就呈現出古董的樣子，而較它完整時更有價值。（……）太監和所有其餘的人都對禮品非常喜歡。”⁽²³⁾ 通過這種宣傳策略，使得人人都知道利瑪竇到中國是為了給皇帝獻禮，因此獲得了一把保護傘。甚至在臨清被天津稅監馬堂扣留時，馬堂也不敢輕易貪污利瑪竇的禮物。

第三是量入制出。送禮是要花錢的，當入不敷出時，利瑪竇也不得不修正策略，量入而出，在送禮時，不再大肆張揚地送西洋奇器，而是改送一些比較容易弄到而又不張揚的禮物。利瑪竇原來在肇慶時過於張揚，不僅在教堂大肆陳設鐘錶、三稜鏡、圖畫、塑像、浮雕地圖、鍍金洋裝書、新穎樂器，而且不斷送給當地官員和士大夫類似禮品，引起了中國地方官員的貪慾，不得不轉為低調。當利瑪竇被迫來到廣東北部韶州城郊並低價購買了一處較為安靜的土地準備建教堂時，教會視察員特別告誡利瑪竇：“千萬避免產生豪富名聲行為或製造‘擁有超出所能給予’之假象。”⁽²⁴⁾ 利瑪竇於是“不顯露任何貴重物品，如銀質聖爵都不拿出來用”⁽²⁵⁾。遇到韶州知府詢問是否帶來鐘錶時，便予以婉拒，送給知府的禮物，祇是一些衣料、玫瑰香精等物，像鐘錶和三稜鏡這種時人豔羨的禮物一個都沒有。在韶州，“一當房子買了下來，利瑪竇神父馬上就去拜訪城裡所有的大官，送給他們一些薄禮，都是從澳門帶給他的東西裡挑出來的。分送這些禮物

時，他小心翼翼地不開這樣的先例：即不適當地多送，或者超過他將來可能饋贈的力量”。⁽²⁶⁾ 不過，一旦能夠承受和必需時，利瑪竇還是大方地向中國官員和士大夫贈送西洋奇器。

利瑪竇之所以能夠通過送禮來達到其傳教的目的，除了能夠洞明中國社會的特質和抓住明代官員的人性弱點外，從文化傳播的角度來看，則是找准了先易後難、由表及裡的正確途徑。西方基督教文化與中國儒家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異，很難在短時間內進行交流和融合，更難以使天主教教義取代儒家思想，然而，在文化的器物、制度和觀念三個層面中，器物或物質是最淺表的層面，兩個異質文化相遇時，器物層面的文化要素是最容易交流和被接受的。而且，器物之中，往往暗含着異質文化的制度和觀念層面的內容，可以在潛移默化中影響對方。利瑪竇通過送禮，向明代中國人傳播了新鮮的西洋科技知識，也通過器物和科技這樣的介質，向中國人傳播了天主教教義和西方觀念文化。

利瑪竇所送禮品的來源

利瑪竇所送禮品從何而來呢？主要有三個來源：一是由天主教耶穌會輸送而來，二是由葡萄牙、西班牙商人及政府捐助，三是利瑪竇就地取材自己製造。

第一，教會輸送

打開中國的大門，直到深入明朝首都北京傳教，是天主教耶穌會的最高目標之一。為了達到這一目標，花多少代價都在所不惜。因此，從羅明堅時代開始，耶穌會便源源不絕地向中國的傳教士們輸送各種禮品。當羅明堅在肇慶傳教初步成功後，羅馬教廷及耶穌會大受鼓舞，“范禮安神父獲得以天主教國王名義頒發的年金，藉以支援中國教團。並且還作了如下安排，即這份津貼由最接近中國的馬六甲銀行支付”⁽²⁷⁾。隨同西班牙皇家監督官羅曼抵達澳門的西班牙耶穌會士桑切斯，“他攜有致澳門神學院院長和致肇慶神父們的信函。（……）鑒於他們的共同宗教信仰，他們極願提供可能有助於教

團發展的一切援助。他們正以佈施的方式送去捐款和別的贈品，其中有一隻精美的鐘是靠齒輪運動而不靠重力來計時的。信中還提到下述的事：在過去若干年中，天主教國王曾贈送中國國王貴重的禮物，但後來得悉它們被誤送到了墨西哥。”⁽²⁸⁾耶穌會會長阿瓜維瓦也“答應盡可能給予援助”⁽²⁹⁾。於是，包括由西方著名藝術家繪製的畫像，製作精緻的計時器，可繫在脖子上小巧玲瓏的掛錶，擺在桌上的座鐘和其它禮品，便從歐洲、日本、菲律賓等地匯聚到中國傳教團駐地。⁽³⁰⁾據《利瑪竇中國割記》載：“耶穌會會長阿瓜維瓦神父（……）還送去一些對傳教工作非常有用的禮物，其中一幅為羅馬著名藝術家繪製的基督畫像，四件製作精緻、樣式美觀的計時器。第三件是錶，可用帶子繫在項上，所以很容易看得見這些精巧的機械作品。第四件要大些，是擺在桌上的一座鐘。它比錶更貴重，因為它結構複雜，沒有擺錘，也因為它不僅準確擊時，還在每一刻鐘和每半個鐘點響三下。這隻鐘成為整個中國議論和羨慕的對象，托上帝之福，它注定要產生迄今仍然是明顯的效果。”⁽³¹⁾

當利瑪竇接手羅明堅事業後，也經常收到耶穌會送來的禮品。阿瓜維瓦不時地給利瑪竇寄送圖籍、地圖、鐘錶等物品。據利瑪竇稱，肇慶會院的主要陳列物，如三稜鏡、大小鐘等都是總會長寄來的；1592年1月利瑪竇在澳門收到總會長寄來的禮盒；1608年8月利瑪竇在北京收到阿瓜維瓦贈送的奧斯定的宗教著作、奧爾德耳的《世界地圖》、比利時出產的懷錶及其他物品。⁽³²⁾（基督教總）視察員（……）還送去一些中國珍品贈給他們，或者是準備陳列出來公開展覽。樣品中的一件是描繪整個中國的圖畫，嵌在特殊的東方框架中（德禮賢疑為《天下總圖》）。這些框架是工藝極其精細的優美屏風，可以一一折疊，打開之後非常美觀，不用支柱就能站立，有時可以擺滿整間屋子。⁽³³⁾

1596年6月28日，利瑪竇在南昌站住了腳跟，準備以此為據點，向北京挺進。教會視察員范禮安覺得，要想實現這一計劃，必須打通萬曆皇帝的關節，否則很難在中國長期立足下去。於是，他搜集

了不少油畫、鐘錶等西方珍品，全部送到南昌，以供利瑪竇支配。據《利瑪竇中國割記》載：“教務視察員范禮安（……）搜集了他認為凡是有助於這個目標的所有物品，都送往南昌府；其中有一幀從西班牙寄來的聖母像，一幀救世主基督像，一個大小適中、製作精巧的齒輪結構的自鳴鐘，能報出一點鐘、半點鐘、一刻鐘。這座鐘是耶穌會阿瓜維瓦會長神父送給傳教團的，希望傳教團能以已經開始的同樣方法繼續得到進展。菲律賓主教也給中國傳教團的視察員神父送來一個和前一座大致相同的鐘。除了這些以外，他還在澳門搜集了他認為會對傳教團有用的各種東西，全部寄到南昌。”⁽³⁴⁾為了支持利瑪竇等人能夠在北京立足，“澳門神學院院長李瑪諾神父為這次旅行寄來了很多錢，但唯恐他們在北京需用更多的錢，所以又給了他們一張匯票，這是從澳門一個商人那裡買來的，他們用這張匯票可以在北京換取同等的金額。”⁽³⁵⁾已經離開日本來澳門的一艘船沉沒，副省區司庫埃吉迪奧·迪·馬塔神父隨船殉職，“整個澳門市都是依靠這艘船所提供的貿易和貨物的。三個傳教基地也依靠它，而且償付在南京購置的住所以及去北京的旅費也都依賴於它”。在這種窘迫情況下，“澳門神學院院長李瑪諾神父就挺身而出，大發善心，也可說是對支援中國傳教會顯示了他慷慨仁慈的精神。他處處籌節錢財，最後湊足了款項，使人人得以度過難關。他還再添上了一些給他的朋友們。他送來了另一座時鐘，加入到獻給皇帝的禮品之中。這座鐘比他們原先的那座小一些，但由於飾有豐富的裝飾，所以看起來很大。他還給他們一幅聖母像，那是他從羅馬收到的，是一幅據說是聖路加所畫原物的逼真的複製本。此外還加上幾個玻璃三稜鏡、鏡子、一些華麗的衣服、亞麻布、小砂漏時鐘和許多玻璃器皿，這些東西都是社交所需，就像是給社會進步的齒輪裡注潤滑油那樣。最後，他還不辭辛勞訂製了幾架風琴，但拖了很久風琴才做好，未能來得及給南京傳教團使用。”⁽³⁶⁾正是在耶穌會的長期和大力支持下，利瑪竇才得以源源不斷地向中國官員乃至皇帝送禮，為其傳教策略服務。

第二，葡萄牙乃至西班牙商人和政府捐贈。

教會的財產和中國傳教團的很多禮物是由葡萄牙商人捐贈的。“澳門有個葡萄牙商人名叫維嘉斯，他施捨錢財和創造錢財是一樣有名。(……)他的捐贈足夠準備全部所需之用。”⁽³⁷⁾ 教會是靠葡萄牙商人到日本貿易獲得利潤後的捐贈而籌集經費的：“期望已久的商船從日本駛進澳門港的日子終於到來了。這就結束了羅明堅神父缺錢用的窘境，葡萄牙人慷慨施捨使他得到大量支援。政府和其他好心的人給教會送來了錢和各種禮物，足以償還債務，完成建築，充分添置家俱。”⁽³⁸⁾ 為了保管教徒捐贈的物資和資金，視察員范禮安神父“還作了這樣安排，中國和日本兩個傳教會應當共有一代理人，或者司庫。他將管理天主教國王捐贈的補助和其他人捐贈的救濟金。澳門的葡萄牙人對這兩個傳教會是經常給予慷慨捐贈的。”⁽³⁹⁾ 西班牙人也捐贈給中國傳教團資金和禮品。當時西班牙治下的菲律賓群島的總督正在召開馬尼拉大主教管區和評議會的大會，“決定給予我們在中國的傳教以某些支持。作出這個決定的主要原因是希望打開西班牙人和中國之間的貿易往來。”⁽⁴⁰⁾

第三，傳教團自己製作

有時候，教會的禮物難以及時到達，而傳教任務又很急迫，於是以利瑪竇為代表的中國傳教團便不得不自己動手，或指導學生動手，製作禮品以送給中國官員。

早在1578年，利瑪竇隨羅明堅等耶穌會士十四人到達印度果阿，在這裡停留了四年，學習機械製造和印刷工藝，“利瑪竇卻在一天中最繁忙的時刻或冒着酷暑，到輔理教士們的工廠去學鐘錶、機械，或印刷工藝”⁽⁴¹⁾，以便為未來的傳教事業作物質準備。他學習了以小型、有彈性、帶鋼捲繞式的發條驅動部件的鐘錶的製造和修理技術，是歐洲16世紀70-80年代技術革新的產物。這種實用技術的掌握，為他後來利用鐘錶同中國士大夫和皇室交往提供了方便。在肇慶時，利瑪竇還專門從澳門請歐洲鐘錶匠前來做製自鳴鐵鐘。當時知府王泮聽說澳門製造鐘錶，就乘羅明堅回澳門求助之際，要求給他

定做一個，答應給以善價。但“錢少買不起長官所要的鐘。作為一種代替辦法，他們就把製鐘匠送到肇慶的長官那裡去。這個人來自印度果阿省，是所謂加那利人，膚色深褐，是中國人稱贊為不常見的。當船隻帶着這名匠人返回並且作了解釋時，長官表示很高興他到來以及澳門修道院送給他的稀罕的歐洲貴重小禮品。他馬上把城裡兩名最好的匠人找來，協助新來的鐘錶匠，就在教堂裡製鐘”⁽⁴²⁾。“利瑪竇開始用銅和鐵製造天球儀和地球儀，用以表明天文並指出地球的形狀。他還有家裡繪製日晷或者把日晷刻在銅版上。把它們送給各個友好官員，包括總督在內。”⁽⁴³⁾

利瑪竇還動手製造了日晷、天球儀等儀器。在韶州時，利瑪竇教他的中國學生瞿太素（汝夔）學習西方有關天象和數理變化的新穎學問，以及製作各種顯示時辰的日晷及運用幾何法則測量物體高度的實用技術。瞿太素為他所學的西學撰寫了一系列精細的注釋，為了說明這些註釋，還繪製了一些圖表，可以與最佳的歐洲工藝相媲美；他運用所學原理，用木、銅和銀所製造的天球儀、星盤、象限儀、羅盤、日晷等科學儀器，精巧美觀。⁽⁴⁴⁾ 這些製作，有時也成為利瑪竇送人的禮物。1596年在南昌時，利瑪竇曾收到其恩師克拉威寄來的三年前在羅馬出版的《觀察星象位置儀器》一書，該書專門介紹羅盤儀表的原理和技術，“書中眾多的、十分詳盡的圖表為里奇（利瑪竇）的天文計算提供了得心應手的計算方式”⁽⁴⁵⁾。利瑪竇當立按照書中圖案的說明，成功地製造出一座刻有二十四個度數（小時）的石質日晷，並將它繪製成精美的石印小冊子，作為禮品送出去。⁽⁴⁶⁾ 在南京時，“靠他的學生們的幫助，利瑪竇神父製造了各種樣式的日晷，分給了他們。隨後，他又從模子裡鑄了許多座，放在各個官員的家裡。除去這些外，他還製造了標明着天體的天球儀和表明整個地球表面的地球儀以及其他科學儀器”⁽⁴⁷⁾，分送給中國民眾和官員。

利瑪竇自製的流傳最廣的禮物是西式地圖。當時已陞任嶺西道的王泮看到肇慶教堂掛着的“一幅用歐洲文字標註的世界全圖和說明時”，表示“很願

意看到一幅用中文標註的同樣的圖”(48)，於是利瑪竇立即開始繪製《山海輿地全圖》，並廣為贈送。1599年末至次年春，利瑪竇居留南京時，應南京吏部主事吳中明的要求，開始修訂原來在廣東省所繪製的世界輿圖，增加一些更詳盡的註釋，由吳中明雇專門刻工，用公費鐫石複製，廣為贈送和散發。據《利瑪竇中國割記》載，利瑪竇“大規模地重新繪製了他的輿圖，輪廓鮮明，便於檢索。他加以增訂並改正了錯誤，毫不遲疑地修訂了整個作品。他的官員朋友（吳左海，即吳中明）對這個新輿圖感到非常高興。他僱了專門刻工，用公費鐫石複製，並刻上了一篇高度讚揚世界輿圖以及其作者的序文。（……）其中有一份送到貴州巡撫手中。他在廣東省時就知道利瑪竇神父，並且出於對他的敬意，他把全部輿圖複製成一本書的形式”(49)。1601年進入北京後，利瑪竇着手繪製更大幅的世界地圖《坤輿萬國全圖》，於1602年繪畢刻版，由李之藻監刻。西式地圖後來也曾作為商品出售，但它畢竟是利瑪竇送人的最佳禮品之一。

由於中國士人比較喜歡西式書籍，因此利瑪竇向耶穌會總會長寫信，要求獲得出版書籍的許可權：“我以為您應把印刷許可權賜給本區會長，以便能快速出版有關書籍，在審查後便可印刷，正如在日本一樣，不必件件須從印度審查長處獲此特准。”(50)不久，印刷書籍的許可權終於交付給中國傳教團，使得贈送書籍更為便捷。

利瑪竇所送禮品的種類

利瑪竇在中國送出的禮品種類，分西洋新式奇器和傳統禮物兩類，具體考察，又有許多品種，現分述於下。

第一，自鳴鐘、日晷及砂漏

據沈定平說，自16世紀70-80年代歐洲開展鐘錶製造技術的革新運動以後，以小型、有彈性、帶發條驅動為特徵的歐洲鐘錶，比我國古代由水和沙驅動、具有擺錘結構的大型鐘錶，顯然要精緻實用得多，因此成為中國人趨之若鶩的東西，也是利瑪

竇在打通關節時經常使用的“殺手鐮”。早在羅明堅時代，便曾向駐肇慶的兩廣總督陳瑞送過“一件漂亮的用銅製作而自動報時的鐘錶”。這塊鐘錶是印度教區主教送給中國傳教團的禮物，由利瑪竇帶到澳門。當陳瑞見到鐘錶能自動報時，且有長短針標出時間時，顯露出驚異和欣喜的表情。利瑪竇更是利用自鳴鐘表為自己打開通道。他在南昌時，送給建安王朱多沐一座臥鐘，“是按他們的計時法製作的，在黑色中國大理石上刻出的黃道帶。這隻鐘還指示日出和日沒的時刻，每月晝夜的長短。時辰還刻在每個月的開始和中間。我們提到開始和中間，因為中國人把黃道帶計為二十四宮。這份禮物受到極大讚美”(51)。送給神宗皇帝的禮品，就有一大一一小兩個自鳴鐘。但在前往北京的途中，在山東臨清被稅監馬堂扣住。馬堂為了討皇帝的好，上疏神宗，講述了利瑪竇所送禮品的情况。直到幾個月後，神宗才突然想起馬堂提到過的自鳴鐘。就問“那座鐘在哪裡？我說，那座自鳴鐘在哪裡？就是他們在上疏裡所說的外國人帶給我的那個鐘。”皇帝隨身的太監答道：“陛下還沒有給太監馬堂的信回話，外國人怎麼能夠未經陛下許可就進入皇城呢？”(52)於是，萬曆皇帝急令找出馬堂的奏疏，批覆道：“方物解進，瑪竇伴送入京，仍下部譯審具奏。”(53)利瑪竇進京後，具疏入貢，開列進貢西洋物品目錄中果有“報時自鳴鐘二架”。神宗皇帝第一次看見那座較大的鐘時，鐘沒有調好，也不走，因此它既不守時，又不報點，於是他命令立刻召見神父們。神父們告訴負責修鐘的太監，這些鐘是一些非常聰明的工匠創製的，“不需要任何人的幫助就能日夜指明時間，它們還有鈴鐺自動報時，有一個指標指出不同的時間。他們還說明這些機器必須有人管理，而且這種操作並不難，僕人們兩三天內即可學會”(54)。鐘調適好後，神宗皇帝迫不及待地將小自鳴鐘放在宮中時時把玩。太監中“有兩個人被准許到皇帝面前給一個小鐘上發條。皇帝一直把這個小鐘放在自己面前，他喜歡看它並聽它鳴時”。神宗將大自鳴鐘安置在皇城附近興建的一座裝飾豪華的鐘樓裡：“皇帝把它送在工部那裡，命他按照神父們所畫的圖

樣為它（大鐘）修建一個合適的木閣樓。這座木閣樓真配得上作為帝王的陳設，其裝飾品就超過了材料的價值。那上面刻滿了人物和亭臺，用雞冠石和黃金裝飾得閃閃發光；在這種藝術方面中國人毫不亞於歐洲人。工部花了一千三百金幣建這座樓，它是一座不大的。但考慮到這種製品價格低廉，歐洲人會說他是花費得太多了。遵照聖諭，這座樓修建在第二道牆之外的一個很漂亮的花園裡。”對於利瑪竇所貢自鳴鐘，顧起元（1565-1628）曾在南京見過：“所製器有自鳴鐘，以鐵為之，絲繩交絡，懸於簾，輪轉上下，戛戛不停，應時擊鐘有聲。器亦工甚。它具多此類。利瑪竇後入京，進所製鐘及摩尼寶石於朝。”⁽⁵⁵⁾

除了自鳴鐘外，利瑪竇還陸續贈送給過中國人日晷和砂漏等其它計時工具。在肇慶時，利瑪竇曾用銅、鐵為原料製作過日晷，分送中國官員。1596年在南昌時，利瑪竇曾按照《觀察星象位置儀器》一書中圖案的說明，製造出一座刻有二十四個度數（小時）的石質日晷，並指導學生們製作，分送給中國民眾和官員。其中贈送給南昌知府王佐兩座石製日晷，“一個他要送回他浙江省的老家，另一個則自己留用。它們很快製好並且送了來。”⁽⁵⁶⁾在成功定居北京後，利瑪竇開始了與中國最高層統治者的交往。在拜訪內閣大學士沈一貫時，贈送給了一個用烏木精製的凹形日晷儀，深受沈的喜愛。⁽⁵⁷⁾利瑪竇還向中國官員贈送砂漏，如曾贈給廣東兵備道徐大任一隻砂漏。

第二，三稜鏡、玻璃器皿

三稜鏡是用玻璃製作的折射陽光的物件，在當時中國人的心中卻是“無價之寶”，比鑽石還要珍貴。因此利瑪竇等人便將之作為重要禮物送給中國官員，並常常恃此化險為夷。早在羅明堅時，就曾送給陳瑞幾隻產自威尼斯的三稜鏡。當陳瑞見到那透過玻璃三稜鏡的折射而映現出多彩顏色時，驚異之情溢於顏表。1585年，為了讓從澳門來的孟三德神父留在肇慶，羅明堅和利瑪竇贈送總督吳文華“一份歐洲的珍貴禮物。最使他喜歡的是我們曾提到的玻璃稜鏡，他很久就想要一個”⁽⁵⁸⁾。利瑪竇接替

羅明堅主持肇慶教堂後，為了博得嶺西道黃時雨的好感，送給他一個中國人視為珍寶的三稜鏡，使黃時雨在關鍵時刻幫了大忙，化解了廣州耆宿老人對傳教士的控告。當利瑪竇隨侍郎石星於1595年4月從韶州出發，從南安乘船抵贛州，在貢水與章水交匯處十八灘翻船時，石星說甚麼也不願再帶利瑪竇同行，利瑪竇再次使出了殺手鐮，將中國人譽為“寶石”的三稜玻璃鏡送給了石星，石星這才勉強同意利瑪竇隨其家屬順水路繼續前往南京。據《利瑪竇中國割記》載：“（利瑪竇）把玻璃鏡送給他（石星）。他猶豫不受最後才勉強收下，對神父們為他所做的一切感謝不止。”⁽⁵⁹⁾在南昌時，時任南京禮部尚書的王弘誨經過此地，利瑪竇等人前去拜訪，“並帶給他一些歐洲禮品，他特別喜歡他曾在韶州見過的玻璃三稜鏡，他認為這是一塊具有巨大價值的寶石”⁽⁶⁰⁾。利瑪竇到江蘇丹陽鄉村拜訪他的朋友瞿太素時，瞿“表現得友好而愉快地接待了神父，那在歐洲親密朋友相逢時也很少看到。他當時住在一座和尚廟宇中，地方很簡陋。他把自己的床讓給他的朋友，但利瑪竇神父沒有同意而自己睡在地板上。他由於工作和旅行過於勞累而患病，幾乎死去。但瞿太素如此之殷勤地照看他，以致他病倒不到一個月，他的健康就完全恢復了，他感覺病後病前還要好。為了回報他的好意，他送給瞿太素幾件禮物，其中有一件就是著名的玻璃三稜鏡。他曾在廣東省尋找這樣一副三稜鏡，願意出高價購買。既然現在他有一個，所以高興得不得了；為了使它更加引人注意，他把它裝在一個銀盒子裡，繫以金鍊，結成環狀。他甚至把銀盒飾以題辭，大意是這件珍寶是一塊補天之物。”瞿太素所接受的禮物引起了很多人的興趣，“有一次有人願出五百金購買這個三稜鏡。儘管他需要很多錢，並且他也想這樣做，他仍拒絕在那時賣它，因為他知道準備進貢皇帝的禮品中有一個相似的三稜鏡；他怕買主可能拿他的三稜鏡去進貢皇帝，那樣利瑪竇神父送給他的這個三稜鏡就不新奇了。後來，在皇帝接受了禮品後，瞿太素才比過去所出的更高的價錢賣掉了他的三稜鏡。賣得的錢使他得以清償許多債務，這件事他永遠不會忘

記，而且也加強了他對教會的熱誠。”⁽⁶¹⁾正如瞿太素所得知的那樣，利瑪竇前往北京時，也攜有送給皇帝的三稜鏡，但在利瑪竇最後開列的禮品清單中卻沒有發現，可能是被天津稅使馬堂私吞了。此前馬堂將利瑪竇等人扣留，將貢品運進官衙，亦將傳教士攜帶的雕像、鐘錶、三稜鏡等據為己有。前二者都已歸還，但三稜鏡則被昧掉了。⁽⁶²⁾這可由顧起元的記載為證。顧氏在南京時，曾見過利瑪竇即將進貢的禮品，其中就有三稜鏡：“利瑪竇後入京，進所製鐘及摩尼寶石於朝。”所謂摩尼寶石，可能就是三稜鏡，但後來正式進貢的清單中並無此物，顯為馬堂所貪。

利瑪竇還曾送給建安王朱多沐“玻璃器皿以及其它這類歐洲產品”⁽⁶³⁾。

第三，西洋琴

利瑪竇所送禮品中，還有西洋琴。在臨清時，馬堂扣曾留了利瑪竇的“裝訂精緻的羅馬祈禱書、翼琴和一本奧特里烏斯所編的《世界舞臺》”⁽⁶⁴⁾。在利瑪竇進京後所提供的進貢西洋物品目錄中，便有“西琴一張”，即馬堂退還的“翼琴”。神宗皇帝對貢品中的西翼琴一度產生了濃厚興趣，指令身邊演奏絃樂器的四名太監拜利瑪竇手下的傳教士龐迪我為師，學習了一個多月的演奏西洋翼琴技巧。利瑪竇還應邀編寫了八支歌曲，稱為“西琴曲意八章”。利瑪竇為此寫道：“萬曆二十八年，歲次庚子，竇具贄物赴京師獻上。間有西洋樂器雅琴一具，視中州異形，撫之有異音，皇上奇之。因樂師問曰：‘其奏必有本國之曲，願聞之。’竇對曰：‘夫他曲旅人罔知，惟習道語數曲，今譯其大意，以聖朝文字，敬陳於左。’”⁽⁶⁵⁾關於利瑪竇所貢的這架西洋琴，一般被稱為翼琴或西翼琴，何高濟等解釋為“鋼琴的前身”，而劉侗、于奕正等稱利瑪竇所貢之物為“鐵絲琴”。⁽⁶⁶⁾據劉善齡稱，利瑪竇獻給萬曆皇帝的“大西洋風琴，祇是一種銅楔擊弦的鍵盤樂器，它的洋名是“克拉維科德”，和另一種羽管或皮管片撥弦的鍵盤樂器“哈蒲賽科德”同為現代鋼琴的祖先，也就是古鋼琴。⁽⁶⁷⁾這與何高濟所說吻合，也與“鐵絲琴”的特徵不相違背。

第三，天球儀、天象儀、地球儀及地圖

天球儀是標示日月星辰等天象的球形儀器，利瑪竇曾將它送給中國官員。在肇慶時，他曾用銅鐵等金屬製作了天球儀，送給徐大任一個。⁽⁶⁸⁾在韶州時，利瑪竇還教會中國學生瞿太素用木、銅和銀製造天球儀等物件，瞿還不滿足，更用銀子來製作這些禮品。⁽⁶⁹⁾在南昌時，利瑪竇“還送給總督（實為江西巡撫陸萬垓）一隻瞄準北極的夜鐘，一副星盤”⁽⁷⁰⁾。這隻夜鐘，應該也屬於天象儀之類的東西。

地球儀是標識地球海陸分佈及國家位置的球形儀器，利瑪竇也曾將它作為禮物送給友人和官員。在肇慶製作日晷和天球儀時，便一起製作過地球儀，以分送官員。在南昌時，利瑪竇還曾送給建安王朱多沐“地球儀……以及其它這類歐洲產品”⁽⁷¹⁾。

利瑪竇花氣力最大、送人最多的是西式地圖。早在肇慶時，利瑪竇便應時為嶺西道的王泮之約，繪製了一幅用中文註釋的世界地圖，刻印後廣為贈送，為利氏帶來了很大的名聲。在南昌拜見建安王朱多沐時，利瑪竇也贈送了兩部西式書籍，“其中一部書附有幾幅地圖，九幅天體軌道圖，四種元素的組合，數學演示以及對所有圖畫的中文解說”⁽⁷²⁾，令建安王十分着迷。這“幾幅地圖”的書，是利瑪竇用手繪製的包括世界圖誌，以及歐羅巴、亞細各洲地圖在內的，並附有中文說明的世界地圖集。⁽⁷³⁾萬曆二十四年（1596），南昌知府王佐希望利瑪竇“能給他製造其它具有智慧性的器物，因此我（利瑪竇）正着手繪一世界地圖，上附有許多注釋與說明。目前尚未竣工，許多智慧高的人前來觀看，無不殷望趕快印刷出來，這在中國將大受歡迎。多年前（1584）我曾繪一幅（世界地圖），祇因註釋不夠詳細，尤其印刷時我不在跟前，因此不如這一幅受更多的人喜愛。”⁽⁷⁴⁾利瑪竇在南昌的好友、中國碩儒章潢在其所著的《圖書編》卷二十九中，就收錄了利瑪竇所繪製的《輿地山海全圖》六幅。據章潢稱：“此圖即太西所畫，彼謂皆其所親歷者。且謂地像圓球，是或一道也。”⁽⁷⁵⁾這顯然是利瑪竇贈送給章潢地圖後，由章潢摹刻在書中的。

利瑪竇還將西式地圖作為珍貴禮物送給神宗皇帝。1598年6月，利瑪竇隨同南京禮部尚書王忠銘

從南昌出發，經過南京前往北京途中，王忠銘發現“在他們所攜帶呈給皇帝的禮品中，有一個大木板，上面刻着世界地圖，附有利瑪竇神父用中文寫的簡略說明”。王氏深感驚訝的是在這樣一個小小的表面上，竟然雕刻出廣闊的世界，包括那麼多新國家的名稱和它們的習俗。⁽⁷⁶⁾在後來利氏向神宗提供的進貢西洋物品目錄中，有《萬國圖誌》一冊，但無木刻地圖。可能被馬堂所扣或損壞。這冊《萬國圖誌》是1570年出版的第一次歐洲印製的世界地圖集，利氏將之列入貢品，“希望中國天子認識整個世界的真貌，發現中國以外尚有遼廣的天下”，“但萬曆皇帝的興趣……在那玲瓏精緻的歐式小鬧鐘”上。⁽⁷⁷⁾

第四，西式書籍、基督教經書、聖母耶穌畫像及雕像、十字架

早在肇慶時，利瑪竇便幫助羅明堅，修訂了羅氏有關基督教教義的著作《天主聖教實錄》，於1584年11月在廣州由傳教士自己購置的機器付印出版。凡遇來教堂參觀的各地官員，都要送幾本帶走，由此一年之間竟散發了數千冊。利瑪竇在拜見南昌建安王朱多沫時，曾送給他兩部用日本紙張印刷而按歐洲樣式裝訂的書籍。1596年10月，利瑪竇在南昌完成自己的著作《天主實義》初稿，1959年初版於南昌，1601年重刻於北京。1608年，利瑪竇奉耶穌會副省會長巴範濟之命，將自己的著作《畸人十篇》在北京雕版印刷。“為了使它為更多的人所瞭解，神父們到處散發這本書並且在規定的時間用它作為禮品以履行他們的義務。他們有些友人把刻印匠派到教會駐地來複製此書，以便他們分贈友人。第一次印行一年之內就發行一空，第二年又印了兩版：一次是在南京皇都，另一次是在江西省會南昌。”⁽⁷⁸⁾

利瑪竇在送給皇帝的禮物中，也有西式圖書《聖經》。利瑪竇進貢之物，在南京時曾向部分士大夫展示，顧起元便曾見其中有西式書籍：“攜其國所印書冊甚多，皆以白紙一面反複印之，字皆旁行，紙如今雲南綿紙，厚而堅韌，板墨精甚。間有圖畫人物屋宇，細若絲髮，其書裝釘如中國宋折式，外以漆革周護之，而其際相函，用金銀或銅為

屈戍鉤絡之，書上下塗以泥金，開之則葉葉如新，合之儼然一金塗版耳。”⁽⁷⁹⁾

利氏同時進貢的禮品還有西洋畫像、雕像和十字架等。在韶州傳教時，利瑪竇曾送給英德縣令蘇大用的父親“一枚基督教救世主的銅像”⁽⁸⁰⁾。他還送給建安王朱多沫“小塑像……這類歐洲產品”⁽⁸¹⁾。利瑪竇在通過濟寧前往北京的途中，曾送給漕運總督劉東星夫人“一幅很好的（聖母像）複製畫，那是南京教堂的一個年輕人製作的”⁽⁸²⁾。1601年1月27日，歷經千辛萬苦進入北京的利瑪竇具疏入貢，奏疏以“大西洋陪臣利瑪竇謹奏為貢獻土物事”開篇，在開列的進貢西洋物品目錄中有〈天帝圖像〉一幅、〈天帝母圖像〉二幅、《天帝經》一本、珍珠鑲嵌十字架一座、報時自鳴鐘二架、《萬國圖誌》一冊、西琴一張等物⁽⁸³⁾。本來還有雕像等物，在臨清時被稅監馬堂所扣，可能貪為己有。對於所貢聖母及耶穌（並非天帝——筆者）畫像，顧起元在南京時也參觀過，稱為“凹凸畫”：“歐羅巴國人利瑪竇者，言畫有凹凸之法。”⁽⁸⁴⁾顧氏見“所畫天主，乃一小兒，一婦人抱之，曰‘天母’。畫以銅板為幀，而塗五彩於上，其貌如生，身與臂手儼然隱起幀上，臉之凹凸處，正視與生人不殊。人問畫何以致此？答曰：‘中國畫但畫陽，不畫陰，故看之人面軀正平，無凹凸相。吾國畫兼陰與陽寫之，故面有高下，而手臂皆輪圓耳。凡人面，正迎陽，則皆明而白，若側立，則向明一邊者白，其不向明一邊者，眼耳鼻口凹處皆有暗相。吾國之寫像者解此法，用之故能使畫像與生人亡異也。’”⁽⁸⁵⁾耶穌受難的十字架也是禮品。當皇帝看到耶穌受難十字架時，他驚奇地站在那裡高聲說道：“這才是活神仙。”但他不敢和這些雕像目光相對，便把聖母像送給了他的母親慈聖皇太后。而她是篤奉佛像的，看到活生生的耶穌受難十字架也感到不安，於是下令把它們放到她的庫藏裡。神宗皇帝“保留了一個最小的耶穌受難十字架，把它放在他心愛的房間裡。這是耶穌會會長神父所贈送的一件珍貴的藝術品”⁽⁸⁶⁾。

第五，絲織品、香料

傳教士除了贈送西洋奇器外，還曾送過一些傳統禮品。如羅明堅在肇慶曾贈送給陳瑞一些純絲衣

料、帶褶的衣服等物，價值超過一千金幣。⁽⁸⁷⁾羅明堅和利瑪竇還曾送給肇慶知府王泮“一張精繡的歐洲手帕，那是他有一個妻子很想留下來的”⁽⁸⁸⁾。利瑪竇在送禮的低調階段，送過中國官員一些比較傳統的禮品，如絲織品和香料等物。在韶州時，送給韶州知府的禮物，就是衣料、玫瑰香精等物品。

利瑪竇送禮的對象

利瑪竇送禮的對象，上至皇帝宗王下至一般平民信徒，但所贈最多的還是文士大夫。徐光啟稱利瑪竇定居北京後，“自是四方人士，無不知有利先生者，諸博雅名流，亦無不延頸願望見焉。”⁽⁸⁹⁾陳儀也指出：“當時都中縉紳，交許可其說。投刺交歡，倒屣推重，傾一時名流。”⁽⁹⁰⁾風流所及，“內而公卿臺省，外而院司守令，莫不敬愛景仰”，“今中土士人授其學者遍宇內，而金陵尤甚”⁽⁹¹⁾。林金水在《利瑪竇交遊人物表》中，考證出利瑪竇交遊過的中國官員及各色人物達一百三十七人之多。“這些人當中有王公貴族、朝廷宰臣、六部各卿、地方名宦、學者、僧侶、商賈，直至黎民庶人，幾乎包括了當時各界的知名人物。”⁽⁹²⁾交往過程中，免不了禮尚往來，下面分別敘述之。

第一，官僚

利瑪竇雖然所定目標是直入首都面見皇帝，但要達到這個目標，必須與無數的官僚打交道。於是，利瑪竇將送禮的物件首先鎖定在這些關乎其傳教命運的士大夫身上。

總督。利瑪竇曾與接替陳瑞的新任兩廣總督郭應聘，以及後任兩廣總督吳文華、吳善和劉繼文打過交道。郭應聘允許羅明堅和利瑪竇等人住在肇慶，“當他們去拜訪他，感謝他賜給他們住所，並且贈送他幾樣小紀念品時，他既不接受禮物，也不讓他們進去。他祇是讓人傳話：不必拜訪他，也不必費心送禮。他認為，如果他們安靜地住在指定給他們的地方，那就夠了。”⁽⁹³⁾1585年，為了能讓從澳門來的孟三德留在肇慶，羅明堅、利瑪竇和“新來者要幹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訪他，送他一份歐洲

的珍貴禮物。最使他喜歡的是我們曾提到的玻璃稜鏡，他很久就想要一個”⁽⁹⁴⁾，這裡要拜訪的“他”就是總督吳文華。⁽⁹⁵⁾利瑪竇前往北京、途經山東濟寧時，還與督修黃河故道兼理漕運的總督劉東星有過交往，劉東星主動修改利瑪竇打算呈給皇帝的文書，寫了一封請北京高官朋友照顧利瑪竇一行人的信件，還派人引導利瑪竇的船隻先行通過狹窄的河道，這背後也有禮品這種潤滑劑在起作用。利瑪竇神父正式回訪劉東星時，“作為交換禮物，他送給總督一些歐洲飾物，這些東西製作新奇，他們缺乏估價。”⁽⁹⁶⁾

道員。明在省與府之間所設監察區稱道，如嶺西道。為整飭某省或重要地區軍事事務所設的監察官員或文官也稱道，如廣東兵備道。當王泮陞任嶺西道後，利瑪竇等人也向這位老朋友送禮，予以祝賀：“友好的長官（王泮）晉陞為嶺西道（遷按察使副使，分巡嶺西道）的高位是一件幸運的事，（……）當他們在他晉陞時像往常那樣前向他獻禮祝賀，他超逾一般的禮貌把這一點表示得很明白。”⁽⁹⁷⁾利瑪竇在肇慶曾送給繼任嶺西道黃時雨一個價比寶石的三稜鏡，他還向廣東兵備道徐大任贈送一隻砂漏和一個天球儀。黃時雨在肇慶地方鄉紳與利瑪竇教堂發生衝突時，化解了矛盾；而徐大任卻在陞任南京工部侍郎後，威脅利瑪竇寄居的旅館老闆將利氏驅逐南京城外。在北京與利瑪竇神父關係很友好的“道裡一級的大員”張德明，從北京返回廣東省，抵達韶州時“在大庭廣眾之間講話，（……）說他接受了他們（利瑪竇等人）贈送的日晷，並且表示他很願意學會怎樣調節它。”⁽⁹⁸⁾

知府。利瑪竇送禮的知府中，第一個便是肇慶知府王泮。1583年從澳門抵達肇慶，羅明堅與利瑪竇拜見了他們稱之為第一個“大恩人”的知府王泮，王知府准許他們在肇慶東郊江邊崇禛塔前建教堂。王知府還為教堂題寫並鐫刻了兩塊牌匾，敲鑼打鼓地送到了教堂。其中一塊上刻“櫻花寺”三個大字，掛在正門上。“長官（知府王泮）常去拜訪神父們，隨他去的有其他高官，（……）他們得到了這位長官對他們提供的很大幫助。為了感激他的好意，作為

紀念物，他們在不同的場合送給過他各種小禮品。他那公認的權威、他在行政中誠實坦率的聲譽，竟至使得人們此後不敢提到驅逐他的朋友的問題⁽⁹⁹⁾。利瑪竇曾贈給王洋一座大自鳴鐘，但王洋不會維修，因此送還給教堂。抵達韶州時，利瑪竇還給當地知府陳奇謀送過衣料、玫瑰香精之類的禮物，但未滿足他想要自鳴鐘和三稜鏡的願望。1596年，利瑪竇在拜見南昌知府王佐時，贈送了兩座石製日晷，王佐希望利氏能夠為他製造“其它具有智慧性的器物”，促使利瑪竇繪製了一幅更精緻的世界地圖。利瑪竇定居北京後，與順天府尹王應麟成為好友，後者還為他撰寫了〈欽敕大西洋陪臣葬地居舍碑記〉。這種交往，應該會是“禮尚往來”的。

知縣。在羅明堅和利瑪竇準備到省城時，在上船時遇阻，“終於，通過向（香山）代理知縣（鄧思啟）贈一筆小禮物的辦法，他們得到了必須的許可”⁽¹⁰⁰⁾。利瑪竇被迫轉移傳教陣地至韶州後，一到達南雄，便徑往拜見南雄知縣王玉沙，並贈送了禮物，而後者“在官府裡殷勤招待他們”⁽¹⁰¹⁾。

巡撫。利瑪竇在南昌時，通過他的一位醫生朋友拜見了江西巡撫陸萬垓（《利瑪竇中國割記》誤以為總督），“利瑪竇神父把鏡子送給他當作禮物時，他怎麼都不肯收”⁽¹⁰²⁾。利瑪竇隨王忠銘抵達南京後，早已對利瑪竇所繪《山海輿地全圖》十分喜愛的應天巡撫趙可懷，特地邀請利瑪竇去其駐地句容作客，予以隆重的接待和禮遇。⁽¹⁰³⁾對於精通中國人情事故的利瑪竇，自然不會空手前往。據《利瑪竇中國割記》載：“利瑪竇以中國方式和總督（實即應天巡撫趙可懷）致意後，就送給他幾件歐洲禮品；這些東西對他說都很新奇，他非常高興地接受下來。”⁽¹⁰⁴⁾

六部卿貳（尚書及侍郎）及其下屬（員外郎等）。利瑪竇認識的第一位六部卿貳官是祖籍肇慶的兵部侍郎石星。萬曆二十三年（1595）四月，石星奉召赴北京履任，因久仰利瑪竇的為人，途經韶州時，主動邀請利瑪竇同船北上。在贛州翻船後，利瑪竇贈送給石星一隻三稜鏡，才使後者同意利氏繼續隨船前進。利瑪竇還曾送給已陞任南京工部侍郎的徐大

任不少禮物：“徐大任在南京的消息使利瑪竇喜出望外。（……）他抓緊時間馬上就去拜訪了這位官員，穿上知識階層的盛裝，攜帶着禮物。”徐大任“一見到利瑪竇神父，他似乎對他的意外出現表示驚愕，但他要獲得誘人的禮物的願望打消他的驚異”，於是“嫺雅地接待了他的客人”⁽¹⁰⁵⁾。為了能夠與南京禮部尚書王弘誨（忠銘）一同從南昌出發前往北京，利瑪竇“帶給他一些歐洲禮品，他特別喜歡他曾在韶州見過的玻璃三稜鏡，他認為這是一塊具有巨大價值的寶石”⁽¹⁰⁶⁾。利瑪竇等人在北京等待皇帝安置時，曾住在禮部主客司所管的會同館裡，送過主客司員外郎一些數學儀器。⁽¹⁰⁷⁾

內閣大臣。利瑪竇在北京站住腳跟後，與政府高層官員多有往來。利瑪竇首先拜訪了內閣大學士沈一貫，贈送了一些西洋禮物，沈氏對用烏木精製的凹形日晷儀十分喜歡。作為報答，沈一貫盛情邀請利瑪竇等人出席有其他大臣作陪的宴會。⁽¹⁰⁸⁾

第二，王公

羅明堅曾因貿然拜訪桂林的靖江王而被視為交通宗王，遭到驅趕。利瑪竇則在這方面做得比較穩妥。在南昌時，他與建安王朱多沫有過交往，在首次拜見時，送給了這位宗王許多禮物，其中有一座“按他們的計時法製作的，在黑色中國大理石上刻出的黃道帶”並能“指示日出和日沒的時刻，每月晝夜的長短”的臥鐘。這份禮物受到建安王的“極大讚美”。利瑪竇還“送給主人一個天球儀，標有天軌，另外還有地球儀、小塑像、玻璃器皿以及其它這類歐洲產品”。其中有兩部用日本紙張而按歐洲樣式裝訂的書籍，“其中一部書附有幾幅地圖，九幅天體軌道圖，四種元素的組合，數學演示以及對所有圖畫的中文解說”⁽¹⁰⁹⁾，朱多沫對此愛不釋手。這位宗王還大方地回了禮。

在南京，徐達後代魏國公徐弘基“派他的叔父邀請利瑪竇神父到他府上（即徐達宅瞻園）去；神父到達後，在全城最華貴的花園裡受到接待”，“他聽說過從歐洲帶進來某些珍奇，因此急於先睹為快”⁽¹¹⁰⁾。顯然，利瑪竇贈給過西洋珍品給這位國公。

第三，皇帝

利瑪竇送禮的最高層次是大明皇帝朱翊鈞。他想通過進貢“方物”達到獲得皇帝允許在中國傳教的目的。據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稱：“萬曆辛巳，歐羅巴國利瑪竇，入中國。始到肇慶（督府駐地），劉司憲某（指劉繼文，時任兩廣總督），待以賓禮。持其貢，表達闕庭。所貢耶蘇像、萬國圖、自鳴鐘、鐵絲琴等。上啟視嘉歎。”⁽¹¹¹⁾文中所謂“劉繼文持其貢”，顯然有誤，但所載進貢給皇帝的禮品，則基本正確。利瑪竇等人對送給皇帝的禮品十分重視，曾經怕被宦官奪去，“覺得最可取的還是由郭居靜神父在去澳門的路上把鐘帶到南昌去，並把十字架、聖像和玻璃三稜鏡交托給皇帝的一位諫官名叫祝世祿的妥為保管，此人是他們的朋友。”⁽¹¹²⁾當他們得到了皇帝的顧問祝石林同意給他們開證件或提供旅行文件的許諾後，“神父們歡欣鼓舞，就把禮品收拾起來，進行一些裝飾性的最後加工。首先他們覺得應該把剛收到的那座大鐘放進一個合適的櫃子裡。他們已在南昌給那座小鐘找到了一個雕花塗金的盒子。但是在裝飾方面，他們不能次於南昌。這座鐘放進了一座有四根柱子的罩子裡。櫃子四面都裝有可折門。時刻在鐘面上用中文大寫字示出，有一隻雄踞的鷹，鷹嘴對準時刻。鐘頂形成美麗的拱形，有各種各樣的花葉紋雕刻作裝飾，還刻有十分精緻的龍。龍在中國是皇權的象徵，除了皇室之外，誰都不准用龍來作為徽記。（……）這隻鐘有相宜的黃金和中國雄黃即硃砂的裝璜作裝飾。它是一件可以在歐洲很好展出的裝飾品。”⁽¹¹³⁾當利瑪竇等人帶着貢品經過收稅官馬堂的地盤時，馬堂“提出要幫助神父們把禮物獻給皇帝；然後，他命令把禮品轉移到他的船上，以便更仔細地檢查它們”⁽¹¹⁴⁾。利瑪竇等人在皇帝的過問下，於1601年1月24日到達北京城廂的一座太監府邸下榻，“他們在這裡把禮物整理停當，以便第二天進貢。第二天這些禮物招搖過市地穿過城市運至皇宮，在那裡和馬堂早先送來的東西放在一起”⁽¹¹⁵⁾。神宗皇帝對利瑪竇所貢之“方物”顯然非常喜歡，特別是對大小自鳴鐘尤其鍾愛。愛屋及烏，他下令畫師將利瑪竇等人的像畫

下來觀看，並對利瑪竇等人特別開恩，賜墓地和宅第，允許在北京建教堂和傳教。自沙勿略、羅明堅以來的願望，至此終於實現了。

第四，官員親屬

利瑪竇等人深通中國之道，對官員的家屬和親戚贈送禮品，以打開在官員那裡不易打開的缺口，達到在官員那裡不易達到的目的。羅明堅和利瑪竇曾贈送給肇慶知府王泮一位夫人一塊歐洲手帕。在濟寧時，利瑪竇還贈送漕運總督劉東星的夫人一幅聖母畫像。在北京，利瑪竇神父等人曾送給沈一貫的公子一份禮物，“後來這位公子也和他們發展了非常親密的友誼，在他父親身居高位的整整八年中間，他一直保持他父親這種仁慈的態度。這當然發展成爲一種不可思議的威望，幾乎在任何事故中都永遠保證了他們的地位”⁽¹¹⁶⁾。

第五，僕人與士兵

除了向官僚士大夫送禮外，利瑪竇等人還向官僚士大夫身邊的僕人或手下兵吏送禮。因為許多事，不通過這些近侍，就無法辦成。而且，這些近侍對主人有直接的影響，通過他們往往能打動官員緊閉的心扉。羅明堅和利瑪竇等人被已遭罷黜的兩廣總督陳瑞趕出肇慶時，便曾向新任總督郭應聘的近侍許諾送禮：“當他們第二次來到肇慶並被免職的總督遣返省城時，新任總督（即郭應聘）的幾個僕人也在場；神父們出一筆錢，請他們無論哪一個設法讓神父們回來。其中有個最低級的士兵，是宮廷衛士，他聽說有報酬，馬上就以譯員的名義向總督遞一份申請，請求在城裡為傳教士安排一所住宅和一块興建房屋與教堂的地皮。看來似乎很奇怪，那個挑剔外國教士並通令嚴斥他們的總督，竟接受了一名普通士兵的申請，並轉飭該地方長官浙江人（肇慶知府）王泮，馬上把它付諸實施。正是這名當宮廷衛士的士兵，被派作使者來遞交歡迎書。”⁽¹¹⁷⁾1598年7月，利瑪竇等人與南京禮部尚書王弘誨同行，“乘船離開南昌。在去南京的航程當中，他們和尚書更加熟悉了，並贈以適當的禮物贏得了他的孩子和僕人們的情誼。他們更為幸運的是還結識了一個人，尚書所有的事情都要與此人商議。”⁽¹¹⁸⁾

第六，文人醫士

比較典型的是瞿太素和李贄。瞿太素是利瑪竇在韶州時的學生，利瑪竇曾教給他許多西洋科技知識和西器製作技術。此人很聰明，一教就會，且製作的奇器還有革新。利瑪竇到北京進貢方物之行，也都是事先跟瞿太素認真商量後才實施的。在交往中，利瑪竇曾送給瞿太素一些禮品。在韶州時，“有一天，他（瞿太素）前來拜訪，穿着傳統的禮服，奉送貴重的禮物，這是學生拜師的風俗。他請求利瑪竇收他當學生，第二天他邀請老師在他的家裡吃飯，送給他綢料為禮。他們送禮是常情，不大好拒不接受，但神父們總是用歐洲珍品作為回報，以免留下他們是為了報酬而教學的印象。”⁽¹¹⁹⁾1592年，在齋戒的日子裡，恰好趕上中國的新年，“利瑪竇神父給他的朋友瞿太素送去一份禮物，瞿太素非常高興，便親自到韶州來回贈禮物”⁽¹²⁰⁾。利瑪竇與李贄的交往始於南京。1599年，時在南京的李贄從朋友們的談話中得知有一“大西洋國”人利瑪竇，便前往拜訪。事後，李贄對利氏印象很好：“一極標致人也，中極玲瓏，外極樸實”⁽¹²¹⁾。接着，利瑪竇回拜了李贄，所談最多的是宗教問題。利氏此次送給李贄他的著作《交友論》，李贄抄寫了幾份，分送給湖廣的弟子們。萬曆二十八年（1600），利瑪竇在山東濟寧劉東星的衙署中又遇見了李贄。李贄對利瑪竇的態度仍十分友好，曾贈與紙摺扇，並題有短詩，贊其不遠萬里觀光上國的精神。⁽¹²²⁾既然李贄贈以摺扇，那麼想必利瑪竇也回贈了禮物。利瑪竇還與時為一般文人的徐光啟（1562-1633）有過交往。徐光啟於萬曆二十四年（1596）曾作為家庭教師隨趙鳳宇赴廣西，遇郭居靜，得聞天主教義及西方科學技術。二十八年結識利瑪竇，三年後入教。後來才中進士，任翰林院庶起士。在與徐光啟的交往過程中，多有禮品上的相互饋贈。此外，馮應京的學生也曾與利瑪竇有禮物上的互贈。當馮“即將被械送入獄的時候，就把他的學生帶到北京去見利瑪竇神父；一當神父們從四夷館的拘留中獲釋，這個學生就去找他們，說明他來訪的原委。行過常禮和贈禮後，他就選利瑪竇神父為他的老師”⁽¹²³⁾。

利瑪竇還曾與一位名醫交往，並送給他一些歐洲珍品。據《利瑪竇中國割記》載：“利瑪竇神父決定去拜訪他的醫生朋友，他穿上一身禮服，免得被人挖苦為和尚。醫生有一份利瑪竇不久前送給他的歐洲珍禮，因為它稀奇，所以他拿它來招惹他朋友們的好奇心。（……）醫生以報答盛情的方式，邀請利瑪竇神父赴盛宴，（……）應邀的有上等階層的一些人，還有些客人是皇帝的親戚。”⁽¹²⁴⁾

第七，信徒

利瑪竇等人信奉基督教的平等觀念，所有教徒都是上帝的子民，因此他們在送禮給中國官員的同時，也適時地給中國的基層信徒送禮。當利瑪竇等人被新任兩廣總督劉繼文驅逐時，他們“送給了新信徒幾件家俱作禮物，他們勉強收了下來”⁽¹²⁵⁾。當然，利瑪竇送給信徒最多的禮物還是與基督教有關的東西。利瑪竇曾發展了一名教徒，是英德縣令蘇大用的父親，當他“呼喚着上帝的名字死去，把一枚基督教救世主的銅像放在自己胸上，那像是利瑪竇送給他的”⁽¹²⁶⁾。

中國官員對利瑪竇送禮的態度

中國官員對利瑪竇送禮的態度，因人而異，折射出官場百態和世間萬象，既反映了中國社會的官場腐敗，也反映出國家的法制威嚴，有時也反映出士大夫的堅定氣節和高雅志趣。

第一，中國官員對於利瑪竇的送禮，一般都表現出“禮尚往來”的態度，符合中國傳統社會基本的人際關係準則。利瑪竇也通過送禮，與中國官僚士大夫建立了良好的互信關係甚至密切的友誼。

在肇慶時，嶺西道王泮對於利瑪竇贈送的自鳴鐘和西式地圖無比高興，用最和藹的詞句來表達他的滿意，並回贈了幾樣禮品”。幾個月後，“他發現家裡沒有人能上鐘，就把它送回去，在教堂裡用以供來客們取樂”⁽¹²⁷⁾。利瑪竇抵達韶州南雄鎮時，拜見了南雄知縣王玉沙，“在同一天，他回拜了神父，各種常禮都齊備，穿戴着全副衣冠，這是官員在自己轄境內拜訪紳士時的排場”⁽¹²⁸⁾。可以說是禮

儀周全。在江西南昌，“利瑪竇神父是總督（江西巡撫陸萬垓）的朋友，所以認為可以通過他的權威而保障教團的安全。於是他準備了幾份他認為總督會喜歡的禮物，（……）總督欣然接受了禮物，慷慨地加以回贈。”⁽¹²⁹⁾利瑪竇為了得到南昌知府王佐批准他們在本地買房居住的文書，送給了他兩個日晷，而王佐也不含糊，“回報的是一筆銀子，大大超過了儀器價值。根據中國的習慣，這筆錢不能退還，因為從一個高官顯宦那裡接受的禮物是從不允許奉還的”⁽¹³⁰⁾。內閣大學士、首輔沈一貫對待利瑪竇送禮的態度是，不僅留他們在家吃飯，而且回贈了豐厚的禮物。據《利瑪竇中國割記》載，利瑪竇“贈送（沈一貫）一些西洋小禮物作見面禮，其中一件是烏木精製的凹形日晷儀，主人特別喜愛。他受到款待和挽留，不僅要坐下來談話而且還要出席宴會。（……）他向神父們回贈的禮物遠遠超過神父們送給他的禮品的價值，包括綢緞和皮貨，價值達四十多金幣”⁽¹³¹⁾。

皇帝接受利瑪竇的獻禮之後，政府官員包括皇帝本人都遵循“禮尚往來”的準則，同時沿用天朝對待四夷朝貢的大方態度，給利瑪竇等人以厚賞。儘管禮部右侍郎掌禮部尚書事朱國祚對利瑪竇等人十分警惕，建議將他們送回澳門或外國，但他仍然遵循禮尚往來的原則，給皇帝上奏，認為“他們的禮物應該加以報償，他還認為利瑪竇神父可以給予穿戴朝官服飾的殊榮，每個神父還應賜予若干超過他們禮物價值的絲絹”⁽¹³²⁾。皇帝則衝破外國人不得留在北京的舊例，允許利瑪竇等人住在北京，並在利瑪竇死後賜以墓地和宅第。

中國人的好禮也讓利瑪竇等人深受感動，並決定“在一有可能的機會時就報答他們受到的恩德”⁽¹³³⁾。有不少中國官員主動送利瑪竇等人禮物，表現出“禮儀之邦”的風範。其中最突出的要算南京禮部尚書王弘誨，當他從北京到達韶州時，拜見了利瑪竇等神父。“他十分大方地不僅表示友誼，還贈送貴重禮品。最使他高興的是對一些數學問題的解法，（……）他答應在他從故鄉回北京的途中，將把利瑪竇帶到京城去校正中國曆法中的錯誤”⁽¹³⁴⁾。這顯然是重其才而不圖其利。利瑪竇送王弘誨禮物，見載

於王氏在韶州送利瑪竇禮之後。當時利瑪竇等人在南昌，王弘誨北返路經此地，利瑪竇等人送給他“一些歐洲禮品，他特別喜歡他曾在韶州見過的玻璃三稜鏡，他認為這是一塊具有巨大價值的寶石”⁽¹³⁵⁾。到達南京後，利瑪竇等人處處受到王氏的照顧。“利瑪竇神父就租了一座不大惹人注目但還寬敞的住房，並應尚書（南京禮部尚書王弘誨忠銘）的請求，接受了輔佐府宅（南京禮部侍郎葉向高）中一些必要的家俱，直到能買到對他的住房更合用的家俱時為止”⁽¹³⁶⁾。祖籍肇慶的兵部侍郎石星因慕利瑪竇等人的聲望和為人，在韶州主動邀請利瑪竇一同北上。當利瑪竇的同伴巴蘭德在贛州“一落水便再也沒有出來”後，石星主動“派一名差人去見利瑪竇神父，轉達他對神父的青年同伴之死的哀悼，還送他足夠的錢支付喪葬費”⁽¹³⁷⁾。當他拒絕利瑪竇同行時，利瑪竇誘以三稜鏡，石星是猶豫再三才勉強接受。可以說石星與利瑪竇的交往也是比較正常的。

還有些官員因為信教或家裡人信教，對利瑪竇等耶穌會士心存感激，主動送上厚禮。如英德縣令蘇大用的父親信教，蘇知縣便“登岸去拜會神父並贈送他們禮物”。由於縣令的這一拜訪，使“韶州的百姓們認為神父們是從肇慶遷居來的而不是被攆走的”⁽¹³⁸⁾，極大地方便了利瑪竇等人的傳教活動。當利瑪竇到達北京後，他的手下、南京教堂神父王豐肅發展了通政使許胥臣為教徒，“為了神父們接受他（許胥臣）歸信，他想要給他們寫一封感謝信和送一份厚禮。但是由於已經說過的原因，也因為行神功而接受任何酬報是違反他們的規矩的，所以他們拒絕接受”。但等到受洗儀式完成之後，許胥臣又“在他原來的贈禮上又增加大量的絲絹以表示感恩，但它再次遭到了拒絕”。起初，許胥臣對於教會“拒不接受他的禮物的辦法多少有點驚奇”，後來則“對這樣做的原因表示稱贊和頌揚”。當他回鄉守孝前，“他再一次把以前被拒絕的禮物送去，這次的方式使人不能不接受了。這時在修建一座新教堂時出了些問題，他捐贈了鉅款來開始這項工程，所用的名義使人不能提出異議祇好接受，如果拒絕就有得罪人的危險”⁽¹³⁹⁾。

在禮尚往來中，有的王公貴族回贈給利瑪竇等人的禮物過於厚重，實際上反映了他們善於擺架子的心理。利瑪竇在南昌時，建安王朱多沫、樂安王朱多煥，“都派了管家帶着重禮去邀請利瑪竇神父到他們的宮裡去”。利瑪竇抵達王宮後，“客人先獻禮，禮品中有中國人所珍視的歐洲物品。其中有一座臥鐘，是按他們的計時法製作的，在黑色中國大理石上刻出的黃道帶。這隻鐘還指示日出和日沒的時刻，每月晝夜的長短。時辰還刻在每個月的開始和中間。我們提到開始和中間，因為中國人把黃道帶計為二十四宮。這份禮物受到極大讚美。以前在中國還從沒有見過這樣的東西。他所知的唯一測時數學器械，還是根據赤道命名的，而且這種器械他們無法精確使用，除非是在緯線三十六度的高處。他也送給主人一個天球儀，標有天軌，另外還有地球儀、小塑像、玻璃器皿以及其他這類歐洲產品”。利瑪竇送的這些禮物“並沒有使建安王相形遜色”，“他的慷慨確實勝過神父：贈禮有絲料、各種重量的銀器、豐富的食品，贈送時還有必要的排場和王室禮儀”⁽¹⁴⁰⁾。

有些士大夫雖然也接受利瑪竇等人的禮物，但並非貪圖其利，對於利瑪竇本人及其科學知識更感興趣，可以說反映了士大夫志趣高雅的一面。利瑪竇應邀拜訪應天巡撫趙可懷時，“就送給他幾件歐洲禮品；這些東西對他說都很新奇，他非常高興地接受下來。看來客人的到來比禮品更加使他高興，他的談興無休無止。在利瑪竇停留中間，他們討論了數學問題並談到歐洲的一般情況，這使總督極感興趣，以致幾乎是把他的客人強行留下了十天”⁽¹⁴¹⁾。

第二，有些中國官員直接索取甚至敲詐勒索和侵佔利瑪竇的禮物和財富。這些人表現出貪婪的本性，也反映出晚明社會官場腐敗的風氣。

兩廣總督陳瑞便曾向羅明堅直接索取過禮品。原肇慶知府、嶺西道王泮是個比較複雜的人物，在與利瑪竇等人的交往過程中，有時候他表現得“禮尚往來”，被稱為“熱心的保護人”，有時候則表現得比較貪婪。當新任兩廣總督吳善即將赴任時，王泮擔心新總督不滿傳教士們住在肇慶，因此決定將

羅明堅、利瑪竇等人送回澳門。於是他們向王泮寫了求情信，“他們的請求然後轉給了那位譚姓建築官吏（即譚君喻），凡有關教團的事長官幾乎都要跟他商量。他這樣做是為了可以從神父所請求的贊許中撈到好處。這兩人是手挽手勾結在一起的。長官（王泮）顯然抱有某種目的，就象他在神父第一次獲允在這裡定居時他所做的那樣。他沒有忘記他收到了二十錠金子和許多小禮品，那都是第二次請求定居後許諾給他的。”⁽¹⁴²⁾當利瑪竇在南昌時，他手下神父郭居靜受到韶州府“第三位官員（董廷欽），即長官的佐貳和教團的敵人”的勒索和報復，“他毫不遲疑地運用他的職權以圖報復他認為是神父對他的侮辱。侮辱的根源是他怨恨當他想要他們的天文鐘時，神父們沒有把它留給他家。他接受了暴徒的訴訟，把教團的兩名僕人叫到他的衙門，當着原告的面痛打他們”⁽¹⁴³⁾。

有的宦官也貪圖利瑪竇的禮物。像南京守備太監馮保，利瑪竇拜訪他時，他就向神父們索取三稜鏡。不過，他在“會見結束時就拿出一件厚禮送給利瑪竇神父。神父沒有接受，也沒有答應把主人所要的玻璃三稜鏡送給主人。”⁽¹⁴⁴⁾利瑪竇等人在臨清被天津稅監馬堂扣押，馬堂甚至侵佔利瑪竇的禮物。“列完清單後，馬堂立刻佔有了這些禮物，把它們運到他的府裡。隨後利瑪竇神父被問到他是否還有甚麼別的東西。因此除了雕像、鐘錶和玻璃三稜鏡外，他又不得不交出他那裝訂精緻的羅馬祈禱書、翼琴（鋼琴的前身）和一本奧特里烏斯所編的《世界舞臺》。”⁽¹⁴⁵⁾“在馬堂拿走的那些物品中，有兩個烏木匣子，一個是十字架的形狀，另一個的樣子像一本書。他還拿去一隻神父們用來做彌撒的銀質聖餐盃”⁽¹⁴⁶⁾。後來，馬堂“將盃子和錢袋都還給了神父，然後開始把較大件的禮品和他放在一旁的其他掠奪品都集中起來，總共約有四十件。他挑了一件飄垂的長袍、一些印度棉布、幾隻玻璃瓶、日晷、砂漏以及其它的新奇玩意兒。他吩咐把這些都運到家中妥善保存，那座較大的鐘和聖母雕像則留給了神父們”⁽¹⁴⁷⁾。儘管這些禮品大多數都送給了神宗皇帝，但仍有一些禮品被這位黑心太監昧掉了。

第三，有些明代官員對待利瑪竇的禮品既想貪佔，又不想擁有受賄之名，因此往往象徵性地給點回禮和錢幣，以造成“禮尚往來”的假象。

在肇慶傳教時，利瑪竇等人受到了當地鄉紳的指控，“處在困境中”的利瑪竇便向嶺西道黃時雨“表示好意”，“利瑪竇就把三角玻璃稜鏡送給了他，他很喜歡用它來觀看，並很渴望據為己有。看來他對這份禮物感到高興，當他打聽到它在歐洲不值甚麼錢時，尤其高興。他懷疑這種說法，疑心他們降低它的價值，好讓他寧願購買它，而不願當作禮物來接受。然後他吩咐給兩枚金幣作為鏡子的價錢，在當時的情況下，拒絕接受則是不禮貌的舉動。中國官員就是這樣始終害怕在官府中被控以貪污罪”⁽¹⁴⁸⁾。將利瑪竇等人趕出肇慶的兩廣總督劉繼文，霸佔了他們值六百金幣的教堂作為他的生祠。為了堵住人們的口，祇象徵性地給了五十金幣，允許利瑪竇在廣東南雄建屋居住，“這位大官拿出一包書送給神父，作為友好的表示。這些書包括總督剿平海寇和其他叛亂的戰爭史”⁽¹⁴⁹⁾。

第四，有些中國官員並不貪圖利瑪竇等人所送的禮物。他們對待這些禮物是祇欣賞而不佔有，表現出士大夫的氣節或對法律的忌憚。

為了感謝肇慶知府王泮，利瑪竇等人送給他一些禮物，“百姓先看到準備送給原長官（知府王泮）的玻璃三稜鏡，驚得目瞪口呆，然後他們詫異地望着聖母的小像。那些仔細打量玻璃的人，祇有驚羨無言地站在那裡。隨同長官的官員們尤其如此，他們越稱讚它，就越引起群眾的好奇心”，面對如此具有魅力的禮品，“我們慷慨的主人（王泮）要求允許把這些珍奇帶到他的官邸去，給他的家人看。後來，神父們又送他一些珍品，請他接受，以象徵友情。他不肯接受，把每一樣東西都退了回去，甚至於包括一張精繡的歐洲手帕，那是他有一個妻子很想留下來的”。王泮的行為，實際上是對法律威嚴的畏懼。就像利瑪竇所猜想的那樣，“由此我們可以傾向於推論說，防止中國官員公開接受禮物的，不是他的良心而是他的畏懼。這裡有這樣的危險，全村的人都看見了這些東西，會控告他接受重禮的

賄賂，竟讓外國教士進入中國，並允許他們永久居留”⁽¹⁵⁰⁾。

而接替陳瑞做兩廣總督的郭應聘，則是一位很有氣節的官員。他即不排斥傳教士，但也決不接受他們的禮物。“總督本人是唯一不願公開接見歐洲人的人。當他們去拜訪他，感謝他賜給他們住所，並且贈送他幾樣小紀念品時，他既不接受禮物，也不讓他們進去。他祇是讓人傳話：不必拜訪他，也不必費心送禮。他認為，如果他們安靜地住在指定給他們的地方，那就夠了。”⁽¹⁵¹⁾此外，像江西巡撫陸萬垓，在面對傳教士禮物的誘惑時，也能做到方寸不亂。利瑪竇的一位醫生朋友拜訪陸萬垓時，告訴他“神父有數學器械可以表明一天的時刻和黃道十二宮以及別的很多事物，分毫不爽”，同時“談到玻璃三稜鏡的奇妙，歐洲書籍中的神奇及其它很多驚人的表現”。陸萬垓聽了這一切後，“想要為自己做一隻鐘”，“要看看玻璃稜鏡，也讓他的家人看看”，“但後來利瑪竇神父把鏡子送給他當作禮物時，他怎麼都不肯收”⁽¹⁵²⁾。

利瑪竇等人送禮並非僅僅是為了禮尚往來，而是通過送禮來獲得人情，讓中國官員為其辦事，以達到在中國定居和傳教的目的。明代官員對待利瑪竇等傳教士送禮持有兩種截然相反的態度，即受禮而為其辦事，和受禮而拒不為其辦事。

第一，受禮而為利瑪竇等人辦事。利瑪竇通過送禮使對方欠其人情，然後再讓他們還情，提出各種要求，使對方滿足。在北京，利瑪竇等人住在禮部主客司所管的會同館時，主客司員外郎“邀請他們和他一起用飯。也請他們為他做點數學儀器之類，這樣一來，他本人也欠了他們的情”⁽¹⁵³⁾。欠了利瑪竇的情，一般的官員都能通過為其做事來還情。

利瑪竇等人在受到肇慶鄉紳的指控時，向嶺西道黃時雨求情，“把三角玻璃稜鏡送給了他”，黃時雨“對這份禮物感到高興”。結果黃時雨及時化解了矛盾，並允許從澳門新來的麥安東神父留了下來。⁽¹⁵⁴⁾被利瑪竇稱之為“皇帝的顧問”的祝石林，“表現出他的真正人品，信守了他的諾言。他照原先所說的那樣，提供了有利的證件，而且他還和許多人一起

饋贈禮品來支付旅途的費用”。祝石林這樣做，“在某種程度上是報答神父們所送給他的幾件歐洲禮物。皇帝顧問最欣賞的是那個玻璃三稜鏡，這是他們交給他保管的。他也認為這是一件價值連城的希世珍寶。神父們動身時，他送給他們一件慷慨的禮物”⁽¹⁵⁵⁾。由於以利瑪竇為首的中國傳教團送了許多禮，做了許多工作，因此得到了豐厚的回報。范禮安神父決定帶着郭居靜從澳門到內地去旅行時，“為了使保證加倍地可靠，他們便要求好幾位大臣寫證明信，這些信都是通過徐保祿的及時幫助而得到的”。傳教士們的朋友“把整個路線安排得非常好，全部的旅行費用都由國家開支。他們走水路時有一艘官船供他們使用；走陸路時，則備有三匹馬和六臺轎”。但范禮安不久就死了，沒有來得及成行。不過“黃明沙修士最先使用了這些信，他到廣東省去接回幾位神父，靠着這幾封信不但不用花旅費，而且祇要拿出信來，連吃飯都有供應，不必花錢”⁽¹⁵⁶⁾。由於利瑪竇等人打下了人情基礎，因此當利瑪竇死後需要一塊墓地時，許多中國官員都向有關負責人寫信說情。“向長官（順天府尹黃起士）說好話的推薦信還有禮部尚書（吳道南）寫來的，長官本人也毫不猶豫接受這些地位如此高的人的信件；因為他們的請求使他們欠他的情，也因為他可以依賴他們的權威，如果有批評者責難他的作法的話，正如確實所發生的那樣。同一天，龐迪我神父去拜訪了長官（黃起士），帶給他一件小禮物，費了很大勁才說服他收下”⁽¹⁵⁷⁾，而黃起士也為此幫了大忙。

第二，受禮而拒不為利瑪竇等人辦事。中國官員中有一些心狠手辣的人，他們禮物照樣接受，而事情就是不辦。徐大任在做廣東兵備道時，利瑪竇神父“有一次送給他一個天球儀和一隻砂漏”，“中國人也還把這些東西看得很寶貴”。因此，當利瑪竇得知徐大任在南京任工部侍郎的消息時，“喜出望外”，“抓緊時間馬上就去拜訪了這位官員，穿上知識階層的盛裝，攜帶着禮物，許多官吏在這種場合都會指望着禮物”。然而，徐大任“一見到利瑪竇神父，他似乎對他的意外出現表示驚愕，但他要獲得誘人的禮物的願望打消他的驚異”。徐大任“嫺雅

地接待了他的客人，請他入內，讓座，然後問他景況怎樣，為何而來”⁽¹⁵⁸⁾。但他卻背着利瑪竇，逼迫利氏所住旅館主將客人趕出去。這既違背了禮尚往來的風俗，也違背了做人的起碼準則。

六、利瑪竇送禮的社會影響

利瑪竇通過贈送禮品，結識了一大批的中國文人士大夫，因此也產生了較大的社會影響。表現在如下方面：

第一，利瑪竇所送禮品多為西洋奇器，因此在吸引中國人眼球的同時，也被另一些較為保守的士大夫視為奇技淫巧，從而加以排斥，導致兩種不同文化的摩擦與衝突。

利瑪竇靠着他的厚重禮物進京後，引起了保守的吏部右侍郎掌禮部事朱國祚的警惕和不滿，曾上疏稱：“《會典》止有瑣里國，而無大西洋，其真偽不可知。又寄住二十年，方行進貢，則與遠方慕義特來獻琛者不同，且其所貢天主、天主母圖，既屬不經，而隨身行李，有神仙骨等物。夫既稱神仙，自能飛昇，安得有骨？則唐韓愈所謂兇穢之餘，不宜令入宮禁者也。況此等方物，未經臣部譯驗，徑行資給，則該監混進之非，與臣等溺職之罪，俱有不容辭者！又既奉旨送部，乃不赴部譯，而私寓僧舍，臣不知何意也。乞量給所進行李價值，照各貢譯例給與利瑪竇冠帶，速令回還，勿得潛住兩京，與內監交往，以致別生支節，且使眩惑愚民！”同時，南京署禮部侍郎沈淮、給事晏文輝等也起而參劾利瑪竇留在南京的傳教士王豐肅，“以天主教在留都，煽惑愚民，信從者眾。且疑其佛郎機夷種，宜行驅逐”⁽¹⁵⁹⁾，引起了軒然大波。

第二，由於利氏所送禮物的確具有技術先進、做工精細和觀念新穎的特點，因此引起了部分士大夫的好奇、驚歎和贊美，從而對西洋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比較，並形成多元的價值觀念。

在南京時，“利瑪竇答應幾位大員，把他準備獻給皇上的禮物給他們看，但他害怕會產生誤會，或者有很多到屋裡來看禮物的好奇人，會惹起騷

動。經過充份考慮和與別人商量，決定要使許願得以兌現，如果他們一連留出幾天，讓百姓自由地來參觀禮物，然後再從效果來判斷今後採取何種辦法。一當傳出展覽皇帝禮物的消息，客人成群地來觀看。禮物的新奇超過他們的預計，以致很多人吃驚得連贊歎的話都說不出來，他們看來不知疲倦地觀賞和議論來過的人告訴別人，再傳給另外的人，直到參觀變得不堪忍受，神父眾叛親離不得不關閉門戶。但參觀者不願被拒之門外。他們甚至準備破門而入，先抗議說，他們堅持要看，不是因為無理取鬧，而是因為他們的羨慕”。他們“大誇歐洲的藝術和宗教”⁽¹⁶⁰⁾。謝肇淛對“西僧利瑪竇”的自鳴鐘“每遇一時輒鳴，如是經歲無頃刻差訛”的精確性驚歎為“神矣”⁽¹⁶¹⁾。中國士大夫對利瑪竇贈送的石印的石質日晷（24度數）冊子很感興，以致於利瑪竇覺得“利用石片也（能）宣揚天主的真理”⁽¹⁶²⁾。利瑪竇率領學生製造的各種“標明着天體的天球儀和表明整個地球表面的地球儀以及其他科學儀器”，受到中國民眾和官員的喜愛。隨着這些西洋科學儀器為達官貴人所欣賞把玩，為一般儒生所揣摩議論，西方基督教和文化也在潛移默化中產生影響。⁽¹⁶³⁾李之藻正是在見到利瑪竇的西式地圖後，服膺西學最後皈依天主教的。他年輕時雄心勃勃，欲繪製中國十五省的精確地圖，當他看見利瑪竇製作的世界地圖時，不禁感歎自己工作的落後，於是向利瑪竇及其他傳教士學習，開始以盡可能大的比例尺重新繪製世界地圖。⁽¹⁶⁴⁾正如沈定平所說：西方數學、天文學及其科學儀器鐘錶等，是最能激發中國士人的好奇心和學習熱情的領域。通過講授西方數學、天文學知識及製作各種新奇的科學儀器，不僅使利瑪竇贏得了“托勒密第二”、“萬能博士”、“歐洲絕頂聰慧之人”的美譽，而且經過在傳播科學中“盡量把天主的要理與教會的規律滲入其中”的辦法，使一些中國士人逐漸對中國傳統知識的先進性和佛教偶像崇拜的合理性產生了某種懷疑與動搖。⁽¹⁶⁵⁾利瑪竇等人“所攜帶呈給皇帝的禮品中，有一個大木板，上面刻着世界地圖，附有利瑪竇神父用中文寫的簡略說明。尚書（王弘誨）非常高興地觀看地了這

幅世界地圖，使他感到驚訝的是他能看到在這樣一個小小的表面上雕刻出廣闊的世界，包括那麼多新國家的名稱和它們的習俗一覽。他願意非常仔細地反復觀看它，力求記住這個世界的新概念。”⁽¹⁶⁶⁾當利瑪竇“把附有描繪性地圖的書或者用圖表和草圖說明的建築模型拿給這些人看時，他們都感到高興和驚詫。整個國家連同城市、宮殿、高塔、拱門、橋樑、大廟等等在一本書中一覽無遺，這種概念他們簡直驚奇不已。同樣的是，他們也羨慕我們的樂器，他們喜歡它那柔和的聲音和結構的新穎。所有這些的影響以及神父們始終是得體的談話和議論，看來使他們逐漸對歐洲形成一個總的好印象。他們發覺，我們的科學從根本上比他們的更堅實，而且總的說來中國人，尤其是有知識的階層，直到當時對外國人始終懷有一種錯誤的看法，把外國人都歸入一類並且都稱之為蠻夷。這樣他們終於開始明白國與國之間所存在的真正區別。”⁽¹⁶⁷⁾這對於破除天朝中心論、建立多元文化觀念有極大的促進作用。

西器禮品還直接導致西方文化的輸入。利瑪竇送給神宗皇帝西翼琴後，後者十分着迷，為了能夠演奏，便派遣四名太監拜利瑪竇手下的龐迪我為師，學習演奏西翼琴的技巧。“在皇帝面前演奏絃樂器的四名太監奉皇帝之命來見神父。在中國人中間，演奏這種樂器被認為是一種先進的藝術，宮廷樂師的地位高於算學家。他們指導皇宮裡一所高級的學校，他們前來是請神父教他們演奏古翼琴的，這架古琴也包括在進獻給皇宮的禮物之中。”龐迪我“每天去皇宮給他們上音樂課。（……）關於這種樂器中國人幾乎一無所知，而龐迪我神父不僅學會演奏，而且還會和絃。”⁽¹⁶⁸⁾在龐迪我的教授下，這些從未接觸過西洋樂器的太監在演奏技法上進步很大。為了能夠奏出西洋曲子，神宗令太監們邀約利瑪竇作詞譜曲，於是利氏編寫了八支歌曲，稱之為“古琴之歌”（中譯名為“西琴曲意八章”）。“這些歌曲非常受人歡迎，許多文人學士都要求神父給他們歌曲的抄本，並高度贊揚歌中所教導的內容。他們說，這些歌曲提醒皇帝應該以歌曲中所提到的品德來治理國家。為了滿足對歌曲抄本的需求，神父

把它們連同其他一些曲子用歐洲文字和漢字印刷成一本歌曲集。”⁽¹⁶⁹⁾利瑪竇神父在南京向獲得贈送《山海輿地全圖》的官員們“解說表示羅馬城的地圖時，也常常乘機介紹宗教制度”⁽¹⁷⁰⁾。利瑪竇還通過向皇帝贈送西洋畫的機會，通過說明介紹歐洲的社會風俗和宗教信仰。當神宗皇帝想瞭解歐洲帝王生活及宮廷情況時，“有一個使團的僕人想起了一幅奉獻給聖名(基督的名字)的圖，上面畫着在煉獄裡的天命、男人和魂靈正在呼喚聖名。這張畫上繪聲繪色有歐洲的國王們以及教皇與一位公爵和一個皇帝，他們的面貌和服飾都描繪得很清楚。這也給了神父們一個機會來解釋耶穌基督是甚麼人；他的名字受到基督教王侯們的崇敬，他就是掌管天地以及地獄的那個人，中國皇帝對他的名字也應當毫不猶豫地表示崇敬”。關於這一切，利瑪竇神父“寫了一份簡單的說明，連同這幅畫送呈給皇帝”。此外，利瑪竇還“向皇帝呈上一幅繪有威尼斯的聖馬可教堂和廣場以及威尼斯共和國的一些旗幟的畫。他們(太監)說皇帝當聽到歐洲的王公們住在樓上時，大笑起來，他認為上下樓梯即使不危險，也很不方便”⁽¹⁷¹⁾。正是通過送畫作等禮品，使西方文化得以灌輸到這位深居宮中的神宗耳中。由於“見面禮”的作用，利瑪竇常常受邀參加中國士大夫的聚會，因此得以將西方風俗及文化傳播出去。如利瑪竇拜訪內閣大學士沈一貫時，贈送的凹形日晷儀令沈氏十分開心，因此熱情邀請利瑪竇等人出席大臣雲集的宴會。“席間，主人愉快地聽取神父們談論他們正在進行的工作，特別是關於基督教風俗的講解”，沈一貫還當眾贊揚了歐洲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¹⁷²⁾通過禮品這種媒介，西方文化“潤雨細無聲”地浸入傳統士大夫心中。

總之，送禮雖云小事，但卻大有學問。由於利瑪竇深諳中國之道和窺透士大夫及皇帝宗室之心，因此投其所好，送上最能代表西方近代科技先進性的自鳴鐘、三稜鏡、日晷、地球儀、天球儀和地圖等禮品，換取這些人在關鍵時刻為傳教士大開方便之門，同時使這些人在把玩觀摩西洋奇器時，對西洋科技和文化產生感性認識，並進一步從心靈和思想上予以接受。傳教士的目的步步地得到實現，

表明其送禮策略基本上是成功的。當然，利瑪竇等人僅僅是以送禮作為敲門磚，其最終目的是以天主教改變中國人的信仰，這一點無論如何都難以辦到。不過，晚明社會由於利瑪竇等人的到來，而在文化上出現了不同以往的變化。雖然這種變化不足以改變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的性質，但畢竟為中國人提供了一種別樣選擇的機會。

【註】

- (1) 如沈定平《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調適與會通》(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等作。
- (2) 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割記》，頁378，中華書局，1983年版。
- (3) 羅漁譯：《利瑪竇書信集》，上冊，頁70，臺北：光啟出版社、輔仁大學出版社聯合出版，1986年版。
- (4)(5)(6)(7) 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割記》，頁382；頁406；頁420；頁594。
- (8) 羅漁譯：《利瑪竇書信集》，下冊，頁457。
- (9) [美]喬納森·斯彭斯著、王改華譯：《利瑪竇傳》，頁226-227，陝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10) 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割記》，頁146。
- (11) 羅漁譯：《利瑪竇書信集》，下冊，附錄，頁434。
- (12)(13)(14)(15)(16) 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割記》，頁416；頁414；頁209；頁635-636；頁389-390。
- (17)(18) 羅漁譯：《利瑪竇書信集》，上冊，頁76；頁208-211。
- (19) 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割記》，頁315。
- (20) 案：《利瑪竇中國割記》頁271、315注皆稱此人為“王弘海”，誤，當作“王弘誨”，考《明實錄》各處皆作後者。
- (21)(22)(23) 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割記》，頁316；頁317；頁322、頁334。
- (24) [法]裴化行著，管震湖譯：《利瑪竇評傳》，上冊，頁91-96，商務印書館，1993年版。
- (25) 羅漁譯：《利瑪竇書信集》上冊，頁98-99。
- (26)(27)(28)(29) 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割記》，頁307；頁189頁；184頁；194頁。
- (30) 沈定平：《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調適與會通》，頁254。
- (31) 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割記》，頁194。
- (32) 羅漁譯：《利瑪竇書信集》，上冊，頁109-110、頁129-13，下冊頁380。
- (33)(34)(35)(36)(37)(38)(39)(40) 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割記》，頁209；頁314；頁335；頁377-378；頁159；頁182；頁314；頁184。
- (41) [法]裴化行著，管震湖譯：《利瑪竇評傳》，上冊，頁50。
- (42)(43)(44) 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割記》，頁174；頁182-183；頁246-247。
- (45) [美]喬納森·斯彭斯著、王改華譯：《利瑪竇傳》，頁187。

- (46) 羅漁譯：《利瑪竇書信集》上冊，頁 249-250。
- (47) (48) (49) 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割記》，頁 352；頁 179-181；頁 355。
- (50) 羅漁譯：《利瑪竇書信集》，下冊，頁 367。
- (51) (52) 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割記》，頁 300-301；頁 400。
- (53) 《明神宗實錄》卷三四，萬曆二十八年十二月甲戌。
- (54) 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割記》，頁 403-404。
- (55) 顧起元：《客座贅語》卷六，頁 193-194，中華書局，1987 年版。
-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割記》，頁 305；頁 423；頁 190；頁 283；頁 316；頁 339-340；頁 394；頁 300-301；頁 394。
- (65) 利瑪竇：〈西琴曲意〉(《重刻畸人十篇》附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齊魯書社，1997 年版。
- (66) 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五，“利瑪竇墳”條，頁 303-304，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 年版。
- (67) 劉善齡：《西洋風——西洋發明在中國》，頁 225，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版。
- (68) (69) (70) (71) (72) 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割記》，頁 289；頁 246-247；頁 305；頁 300-301；頁 301。
- (73) 洪煨蓮：〈考利瑪竇的世界地圖〉，《禹貢》半月刊，第 5 卷，3-4 合期。
- (74) 羅漁譯：《利瑪竇書信集》，上冊，頁 232。
- (75) 章潢：《圖書編》，影印四庫全書本，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版。
- (76) 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割記》，頁 320。
- (77) 沈定平：《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調適與會通》，頁 387。
- (78) 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割記》，頁 488。
- (79) 顧起元：《客座贅語》卷六，中華書局，1987 年版，頁 193-194。
- (80) (81) (82) 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割記》，頁 250；頁 300-301；頁 387。
- (83) 李秋：《增訂徐文定公集》，徐家匯天主堂藏書樓，1933 年印於上海。
- (84) (85) 顧起元：《客座贅語》卷六，頁 153；頁 193-194。
- (86) (87) 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割記》，頁 402-403；頁 148-149。
- (88) 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割記》，頁 164。
- (89) 徐光啟：《徐光啟集》上冊，頁 86-87。
- (90) 陳儀：〈性學辨述序〉，載徐宗澤編著：《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頁 212-213，中華書局，1989 年版。
- (91)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三〇，“大西洋”，頁 784，中華書局，1959 年版。
- (92) 林金水：《利瑪竇交遊人物表》，載中外關係史學會編：《中外關係史論叢》第 1 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5 年版。
- (93) (94) 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割記》，頁 167；頁 190。
- (95) 在《利瑪竇中國割記》中，始終未交待這位被拜訪者究竟是
何人。但據筆者考證，此人當是吳文華。吳文華是萬曆十一年（1583）十一月至萬曆十五年（1587）六月在肇慶任兩廣總督。據《明神宗實錄》卷一四三載，萬曆十一年十一月甲辰，“陞刑部左侍郎吳文華為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兼巡撫廣東。”又據《明神宗實錄》卷一八七載，萬曆十五年六月癸酉，“陞總督兩廣巡撫兼兵部右侍郎吳文華為南京工部尚書”。孟三德來到肇慶是 1585 年 7 月稍後，正是在吳文華任內。
-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割記》，頁 386；頁 183；頁 534；頁 167；頁 155；頁 263；頁 299；頁 320-324；頁 322；頁 289-290；頁 316；頁 414。
- (108) 沈定平：《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調適與會通》，頁 385。
- (109) 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割記》，頁 300-301。
- (110) 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割記》，頁 357。
- (111) 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五，“利瑪竇墳”條，頁 303-304。
-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割記》，頁 376；頁 383；頁 390；頁 402；頁 424；頁 158；頁 318；頁 246；頁 263。
- (121) 李贄：《續焚書》卷一，〈與友人書〉，頁 315，嶽麓書社，1990 年版。
- (121) 李贄：《焚書》卷六，〈贈利泰西〉，頁 250，嶽麓書社，1990 年版。
-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割記》，頁 429；頁 295；頁 229；頁 250；頁 182；頁 263；頁 304；頁 305；頁 423-424；頁 419；頁 387；頁 272；頁 316；頁 346；頁 282；頁 251；頁 596；頁 300-301；頁 322；頁 199；頁 308；頁 358；頁 384；頁 396；頁 397；頁 213；頁 232；頁 164；頁 167；頁 299；頁 414；頁 213；頁 383-384；頁 520；頁 631；頁 289-290。
- (158)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三〇，“外國·大西洋”條，頁 783-784。
- (159) 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割記》，頁 375。
- (160) 謝肇淛：《五雜俎》卷二，天部二，頁 40，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 年。
- (161) 羅漁譯：《利瑪竇書信集》上冊，頁 249-250。
- (162) 沈定平：《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調適與會通》，頁 359。
- (163) 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割記》，頁 432。
- (164) 沈定平：《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調適與會通》，頁 357。
-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割記》，頁 320；頁 213；頁 407-408；頁 401；頁 381；頁 406-407；頁 423-424；頁 423-424。